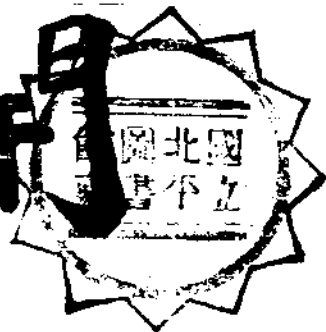


第一三五期

請  
交  
換

# 南開大學 週刊



南開大學出版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出版

# 南開大學週刊

第一三五期

目錄

蘇俄農業之集體化

嘗試與錯誤

國家概念的分析

蘇俄新作家札米亞丁

未婚妻

英文副刊

## 本社啓事

本刊定於十二月二十四日出  
一文藝專號，師長同學如有  
鴻文鉅作，請於十二月十一  
日以前交下爲荷。

李陵

陳孚華

趙純孝

墨札

徐卓羣

# 清華週刊社會科學專號目錄

第三卷第八期

清華週刊社會科學專號目錄	李景漢
社會調查在今日中國之需要	李景漢
國難中救災問題	章元善
從工業化之程度觀察	吳半農
目前中國之經濟性質	蕭公權
晉代反政治之政治思想	C. Y. Wu
Balance of Trade of China	C. Y. Wu
增加中國農民收入的途徑	吳景超
羅索論西方文明	張申府
最惠國條款的解釋	王鐵崖
購買力平說	蔡可選
不平衡的性比例問題	李寬
歷來國聯調查團	王彥美
關於會計學的常識	余肇池
政治威權的理論基礎	高士銘
馬蘇耳價值論述要	梁方仲
中國市政問題	董修甲
世界軍縮運動之經過與困難	王化成
公道與法律	燕樹棠
介紹	Hernan Fin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odern Government
與	趙德潔
批評	評張映南先生的社會法學的理論
	鄒庸

價目：全卷十二期 一元八角  
 (郵費在內) 本期零售大洋三角五分  
 發行者：北平國立清華大學  
 社經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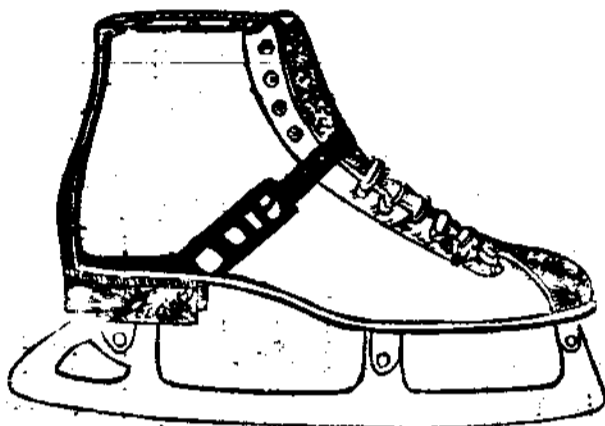
## 第三卷第七期要目

中西接觸以後的經濟變化	王造時
英國對日態度的分析	袁道豐
書合肥軼聞	惜陰
錢鍾香先生筆記(續)	
古代中國與世界之關係(續)	廖世功
讀書提要	
鮑令著實驗心理學史	沈有乾
大事類表(八月)	
新出圖書彙表	
最近雜誌要目索引	
(共一千五百四十八目)	

另售每冊三角郵費二分  
 全年十冊國外三元八角郵費在內  
 上海路亞爾德路一號南  
 家塘一號南  
 人文編輯所  
 上海代售處  
 上海新泰新  
 南現代新  
 東北新  
 神州國光社  
 等書局  
 代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

# 華美鑫皮鞋莊

滑冰大家注意欲買最新式最經濟  
最適用男女冰鞋冰刀請到華美鑫



每星期二五午間來本校交易所

新式鋼冰刀由一元五至二元二毛  
新到美國鋼冰刀每雙二元五毛  
堅固耐用各種冰靴每雙四元至四元五毛  
新式呢絨暖鞋特別價廉  
總店南開學校對過支店法界新新影院對過  
電話五局二一五一號

# 祥發西服莊

開設南關下頭中西女校對過

上海名師 專做西服  
式樣時新 品質優良  
手藝精巧 身量準確  
價錢公道 交活迅速  
如蒙賜顧 無任歡迎  
每日在本校交易所侍候  
諸君認明招牌「攝毛」

關於本號承作之个

男女時裝：品質的優良，式

樣的新穎，手藝的高妙，價格的低廉，請問穿漂亮時髦衣服諸君便知。

常來本校交易所

法租界天增里茂錫洋服莊謹啓

# 中原公司

冬季大減價

念一天

十一月十日起

△每天更有特別大廉價貨品分都大賤賣  
△按日更換每天不同務請親臨勿失機會

## 營業時間

由上午九時  
至下午九時  
星期日下午  
一時至九時

## 總店

旭街大馬路

## 分店

法租界中華路

## 西裝

今日一般「摩登」青年翩翩公子莫不以穿西裝為尚做西裝者多矣而精於是術者少本號有見於此不惜重資特聘超等名師承做一切時髦西裝如蒙賜顧無任歡迎

英租界朱家胡同胡鴻記西服店謹啓  
中間路北

## 國聞週報

第九卷 第四十六期要目

- 美國總統選舉……………記者
- 國際聯盟成敗論……………李作藩譯
- 外交民主化……………梅叔
- 關於竹書紀年詩書春秋左傳的幾樁公案……………陳振先
-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大炎
- 一週大事日記……………大炎
- 論評選輯
- 采風錄

天津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辦理  
各種存款  
各種儲蓄  
國內匯兌  
旅行支票

地點：法租界八號路電話三〇九八〇

辦公時間：除星期日外每日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

天津  
中國旅行社

專理  
預定船位  
經售車票  
指導留學  
代領護照

本校辦事處在秀山堂旁每星期二、四、六下午半時至二時

天津金城銀行儲蓄處

禮券紅素兩用

種類二元四元六元八元十元

利息年息四釐

兌現隨時憑券支取

行址 東馬路法租界梨棧

天津中原商業儲蓄銀行

儲蓄部

各種定期活期儲蓄存款

時間

上午十時起至下午八時止  
星期六亦同  
星期日下午一時起至八時止

整存整付  
零存整付  
存本付息  
定期存款  
活期儲蓄  
利息優厚  
手續便捷  
詳細章程  
函索即奉

# 蘇俄之農業集體化

李陵譯

俄國當採用改造國家經濟的五年計劃時，經濟政策之負責當局，即認清計劃之成功，將受農業生產品過低的標準之打擊，蓋自革命以來，農產品之減少甚鉅也。於是俄政府採取一種進步的農業集體化政策，計劃改組小規模農場，合併之於合作的組織或集產制度，使其在—種規模之下，能應用現代機器耕種方法，消除散漫的自營農場耕種的耗費。先是，五年計劃程序本定將農業五分之一，加以集體化；但不久即超過此種比例，而原計劃之項目，亦有不少變更。本文係敘述集體化之方法，完善的集體農場之組織與工作，及就統計的及其他的報告，敘述五年計劃中農業部分第一二年實施之結果。

## 集體化實施前之俄國農業

大戰以前，俄國農業，極為守舊與落後。幼稚的技術，舊式的耕種方法，利用畜力的農業，已無荒地區域內擴展過廣的耕種之保持，農業過剩人口增加之速，與夫農場規模之狹小；凡茲種種，均足以說明俄國農業生

產所以在水平線下之原因。

革命以後，此種情形仍未改善。革命時期，因土地重新分配，致農場平均面積減低，以及富農(Kulaks)所有農場與大地產破壞之結果，農業效率與生產總量，更呈退減。政府之穀物徵集政策及有步驟的攻擊富農，亦足以加劇農場分化及市場生產品低減之趨勢。蘇俄人口增加甚速（每年增加自百分之二·五至百分之三）。農業生產，在新經濟政策時期雖有增加，但不若人口增加之速，一九二八年以來，且呈退減之象。每人平均穀類總產量，一九一三年為六·三坤特爾(Quintals, 每坤特爾等於二二〇·四六磅——譯者)，而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則只為五·一坤特爾。戰前穀類之銷售，佔總產量百分之二十六，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其比率降至百分之十二。一九二九年之頃，農業之不景氣，幾使一切經濟發展，為之停滯。

當五年計劃草擬之際，蘇俄經濟領袖，已明瞭需要

一強有力的運動，以改進農業生產；因欲使工業化計劃之迅速實現，必須增加原料品及食糧之生產，並須強制農業生產品之輸運出口也。惟彼等並不贊成採用該政策之原則。增加收穫總量及市場生產品，有兩種可能的途徑，非鼓勵大規模的私人經營，即擴大與在技術方面改組小規模農場，使之成為合作的組織。重建國家經濟之五年計劃，在此兩法中，採取折衷之道，並決定在該計劃實施期內，集體化範圍，只佔全國農業五分之一。但一九二九年之末，農業原料之缺乏，及農人拒絕以不平等價格將其產品交由國家支配之兩種事實，已漸明顯，而計劃負責當局尚未充分注意及之。農產品之徵集，使耕地面積，生產總量及其銷售比率，兩方面均一致低減。於是共產黨政治部決定促進集體化之進行，並從事於生產政策及農村社會組織兩者之徹底改造。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廿七日，共產黨秘書長史達林(Stalin)在馬克斯土地經濟學家會議之演講，曾保證大規模集體化之成功。

### 一九三〇與一九三一集體化之方法與效率

一九二九年年底以來，共產黨機關及地方蘇維埃官吏，已將大規模集體化之方針，推行於全國。宣傳與各種經濟的及行政的壓迫，兼採並用。集體農場(Kolho)之農民，在租稅及信用上享有特權；同時自耕農則課以重稅，彼等不能享受醫藥治療及農業專家指導之權利，不能購買必需的用具及工業生產品，其子女入校之權利，亦被剝奪。

此種使農民加入集體農場之壓力，在各階級農民中，自發生不同之影響。大多數貧農之祇有土地而缺乏牛馬及其他耕種必需之家畜與用具者，常將土地租與富農，加入集體農場，以期改善其環境。中農之視經濟獨立為有利者，則極反對併入集體農場，彼等之大部，因感覺政府政策之剝奪其自營農場之自由的基礎，始行加入。集體化進行之初，富農反對併入集體農場。但當行政壓迫開始實施時，彼等即審慎決定，參加集體化運動，希望將其一部分財產併入集體農場，即能保護其農場，不致受官吏之干涉。先是，缺乏生產工具及牛馬之集體農場，曾容納富農之參加，但不久即發覺富農之加入，係在保護其財產，且在集體農場內，彼等仍繼續為自營農場而奮鬥。於是政府根據政治上及經濟上的理由，決定不容富農於集體農場；且決定進行肅清富農運動，以消滅富農階級。

此政策所採取之主要方式，除上述方法外，為沒收富農之機器，家畜及生產工具，以供集體農場之用。根據官方公佈之數字，一九二八年各穀物生產有剩餘之主



要區域中，富農階級所耕種者，幾超過全國農場百分之十，其所佔有之農具，約為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家畜則超過百分之三十；而貧農階級所耕種者，約合全國農場三分之一，佔有農具，只合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七。有許多農場中，且完全缺乏牛馬。一九三〇年一月四日，政府訓令地方蘇維埃當局，除必需衣物外，沒收富農之一切財產，並流放富農及其家屬于北部諸省。富農之生產工具，家畜及房屋，於是為國家沒收，轉授與集體農場。農民之反抗此種強制的集體化者，悉遭逮捕，並罰作苦工，第一年且常用死刑，以壓止彼等之反抗。

應用此種方法之結束，集體化之進行，不獨較五年計劃之估計為速，且超過中央當局理想中之最高限度。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日，農業集體化之比率為百分之二十一·六，二月一日，增至百分之三十二·五，二月十日增至百分之四十二·四，而三月一日，則實際上已達百分之五十五。然而此種進行，在家畜飼養方面之影響，適得其反，蓋農民認定，與其將家畜併入集體農場，無寧自行將之屠殺也。此政策施行之第一年，馬之頭數減少逾百分之十一，公牛頭數減少百分之二十，母牛頭數減少百分之十二，羊之頭數減少百分之二十四，豬之頭數減少百分之三十五。

農民方面時常發生之不平表示，與家畜之大量屠殺

，引起蘇維埃政府於一九三〇年春減低集體化之速率。集體化進行之緩和，此外尚有一附帶的原因，即因集體農場之急劇的增加，生產工具與貸款之需求，政府當局均不能應付是也。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共產黨秘書長史達林作一有名之演說，題為「急於成功之流弊」，在此演說中，彼謂：據數地之報告，有用軍隊報復，與斷絕食水及工業生產品之供給的恫嚇，以威脅反抗的農民，使之加入集體農場。斯氏反對各種農場之完全集體化，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五日，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並採納緩和集體化進行之決議。集體化農場之數目，於是逐漸減少，一九三〇年十月一日，降至全國農業百分之二十一至二十四之間。

但一九三一年春季，共產黨政治部特別決定，重新開始肅清富農運動，於是多數農民，復因反抗合併於集體農場之故，被放於北俄羅斯。斯時集體化之進行，已不若前此之速，但能較為持久。政府並明定條款，以限制自耕農：小農及中農如反對加入集體農場，即被認為富農之同謀者，與集體農場及蘇維埃政府之敵人。

自耕農之環境，於是陷於難堪。彼等分得極殘廢之土地，不得再行借款，被徵極苛之稅（收入百分之三十至七十）不能購買生產工具與銷售其產品；種種苛待，

不一而足，此外又常有被殺收財產及放流之危險。一九三〇年，集體農場之比率，復開始急劇的增加，一九三一年三月一日，約增至百分之三十五，四月一日增至百分之四十二，五月一日超過百分之四十八，六月一日增至百分之五十二·七，而七月一日又復增至百分之五十五。主要區域之進行，尤為緊張。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底，全俄集體農場的比率，約達百分之六十二。經數月最大之努力，再行推進大規模集體化後，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於一九三一年八月二日議決，再行緩和集體化之進行，以鞏固集體農場之經濟的及行政的基礎，蓋集體農場為共產黨最近的將來之目的物也。

下表為每年十月一日集體農場數目之統計，表明集體化增加率（微小之漲落不算在內）之穩定的情形。

集體農場數 (單位一千)	加入集體農 場之農場數 (單位一千)	佔全體農場 之百分數
一九二六	一七·八	〇·八
一九二七	一八·八	一·一
一九二八	三八·一	二·三
一九二九	六七·四	七·六
一九三〇	九六·二	二一·七
一九三一	二二八·〇	五八·五

普通集體化時期中，集體農場有三種不同的形式。

第一種為侶耕社 (Тов), 農人自行保有其土地及生產品，只將複雜的機器與家畜，歸為公有。第二種為阿爾特 (Арт), 農人之加入此種集體農場者，須將全部生產資本與最重要的農具，歸為公有，只能將消費所必需之部分（如住宅，作坊，花園，果園，家禽，豬，羊等，又每家祇限養牛一頭），留為私有財產，以供個人使用。第三種為農業公社 (Колхоз), 此為最合理的形式，全部資本，生產與消費，完全集體化。

當普通集體化之第一期，以最簡單的侶耕社為最普遍。但在肅清富農運動之後，政府努力於農業之迅速社會主義化，地方當局，特別是派赴鄉村之共產黨教師，均集中精力於組織農業公社。結果，集體農場有成為由國家一手造成之組織的危險，其增加市場生產品之興趣，反不及倚靠政府取得必需物品的興趣之濃。於是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於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五日，訓令以阿爾特為集體農場之模範，儘先加以發展。此種變策之助成的動機，係由於政府欲使農民易於由自耕變為集合耕種。根據官方數字，各種集體農場之百分比如下：

日期	農業公社	阿爾特	侶耕社
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	七·三	四六·〇	四六·七

蘇俄農業集體化

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	五·〇	三三·九	六一·一
一九二九年十月一日	六·九	三〇·八	六二·三
一九三〇年五月	八·八	七四·一	一七·一
一九三一年二月	六·八	八一·五	一一·七

各道 (district) 佃耕社公有家畜比率，佔一九二九年全數百分之十三至二十八之間，阿爾特公有家畜比率，佔一九三〇年全數百分之三十三至九十九。而農業公社公有家畜則為百分之一百。阿爾特與農業公社公有機器與農具，比率之高，兩者相等。

第一期之集體農場，規模並不甚大，一九三〇年中，中央當局訓令建立大規模集體農場後，許多規模在中小以下者，均合併成大農場。據經驗所示，規模過大之集體農場，反不經濟，於是許多集體農場自其全部中，分出若干農場。一九三一年年底，政府將最大之集體農場，分成若干較小之獨立單位。下列數字，可以表明此方面之變更：

	每集體農場之平均面積	每集體農場之農場平均數
一九二八	二八	一五
一九二九	七三	二八

(單位海克他)

一九三〇	四二七	五八
一九三一年五月	九〇七	一一〇
一九三一年十月	三七五	六三

穀物生產有剩餘之重主區域，大集體農場尤多。例如：下窩爾加 (Lower Volga) 集體農場平均面積約為二千四百海克他 (hectares, 每海克他等於二·四七畝，譯者)，北高加索 (Northern Caucasus) 則超過一千七百海克他。日耳曼窩爾加共和國 (the Republic of the Volga Germans) 與北高加索，有等集體農場之面積竟達八千至一萬海克他。一九三〇年時集體農場只設於產穀區域；而一九三一年則出產其他農產品 (如棉，糖，葡萄，亞麻，茶等) 的區域，亦設立許多集體農場。政府且銳意獎勵飼養家禽與畜類的集體農場之組織。然因為幅的限制，本文以下所討論者，祇限於穀類阿爾特。

在集體化農業現狀之下，機器與牽引機站，日增其重要。普通集體化之第一期，蘇維埃政府為改良農人耕種技術起見，曾採信用方法，直接售賣生產工具與集體農場。此種經營一九三〇年之後半年，即行取消。目下集體農場所自備者祇有比較簡單的機器及日常用具。所有複雜的機器，特別是牽引機，及馬匹之大部分，統由國家交與牽引機站保管。此等國營事業，凡集體農場之

播種，收穫及打穀等主要耕種工作，均由其代為辦理，在可能範圍內，亦可為自耕農耕作。根據政府訓令，機器由站供給，工人由集體農場擔任，而全盤工作，則由站長指揮。牽引機站獲得集體農場出產之一定的比例，以為報酬。此種報酬，係由合同詳細規定。

牽引機站數目之增加，非常迅速。一九三〇年共有一百五十八處，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增至一千四百處。因國家工廠牽引機及其他農機出產之速，分佈全國之現有牽引機站乃愈趨完備，而新牽引機站之設立，亦隨而增加。一九三一年各機站耕種土地，達二千九百三十萬海克德。因此，國家乃得管理生產工具之大部，而能控制全國之農業生產。

### 集體農場之組織與工作

集體農場之活動，係受農業委員會及集體農場中央聯合會頒佈之命令與組織法管理。今日集體農場最普通形式的阿爾特組織法，起草於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其後加以補充，公佈於一九三〇年三月一日之真理報 *Pravda*。篇幅所限，茲僅能述其要點而已。

集體農場係「農作工人，農民及小農之組合」，彼等之目的在「合併生產工具與人工，成一集體的事業，以獲得生產，勞動之最高效率，及大量的生產剩餘」。

(第一節)。任何工人，年齡在十六歲以上者，皆得為集體農場之農作工人。富農非得其家屬之服役於紅軍，前共產黨黨員，或為救員者之保證，不能加入集體農場(第五節)。因充分利用土地之故，規定所有溝渠等物之用為阿爾特農作工人之土地界限者，一律取消，合併所有地畝，由阿爾特集合耕種。

阿爾特農作工人，只許保留其附屬於農場建築物(如廚房，花園，果園等)之土地，以供私用。從公有財產中分給土地與退出阿爾特之農作工人，絕對禁止。此等退出之農人，祇能從尚未開發之國家土地中，得到補償；但目下此等土地中，已極少含有比較可耕的土地，故退出集體農場，實際上等於喪失其地產。

農民之加入阿爾特，須將其牛，馬，供食用之家畜，所有農業設備，農場建築物，農產品碾磨器具，及種子飼料貯藏室等歸為公有，個人留為私有者，則住宅，零星用具，家禽，豬，羊，及乳牛一頭而已。

新社員財產，不論已否歸公，須以現金繳納其總值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十，以為入社費。此種款項，可以分期交付。

每阿爾特均有一種由下列各項構成之儲存資金(*divisible fund*)：(一)入社費；(二)以阿爾特之大

小爲標準，自公有財產總數中，除出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五十；(三)國家授與集體農場之被沒收的富農財產；(四)國家之現款的，生產工具的，或家畜的津貼。所餘之公有財產悉歸耕作工人。耕作工人之退出阿爾特，可以發還此部財產；惟須在農業年度終了時，始能發還。

阿爾特事務，由全體大會管理，在耕作工人過多之集體農場，則由代表會議及管理委員會執行之。社員大會或代表會議之工作，爲表決較爲重要之議案，與選舉管理委員會委員及審計員。所有議案，均公開投票表決。管理委員會任期一年，執行阿爾特一切事務，各項工作，由委員自行分配。每阿爾特必須加入一種集體農場的組合，在其指導之下，進行工作。

集體農場之行政與工作管理，實際發生不少困難，其最主要者，厥爲缺乏有訓練的管理員，及行政費之過大。而有經驗人員（農業專家，獸醫，技師，會計師等）之缺乏，尤屬最嚴重的問題。爲加速養成應用人員起見，已縮短專門學校及農業專門學校之畢業期限，同時並將多種專門課程，由六個月延長至九個月，而函授學程，亦已設立。雖有此種種努力，但據數月前之估計，一九三二年合格人員之缺乏，尤甚於一九三一年，專家

之求過於供，達八萬人。

在別一方面，管理委員會，審計及會計部之中下級行政人員，則有極大的增加，但與農業生產無直接關係。農業委員會根據一九三一年十月九日真理報作一研究，行政費平均佔每農場總收入百分之十至十四，約合五十盧布。有等集體農場，行政工作竟佔每日總工作百分之十八至二十。管理員之時常更換，有時一季更換三四次之多，使集體農場蒙受極大之損失。

集體農場中有組織的共產黨員之比率，自烏克蘭（Ukraine）之百分之一起，以至北高加索之百分之二十止，各地不同。集體農場中共產黨員之爲管理委員會委員者，超過百分之二十五。

集體農場之工作組織，述之如下。農民分爲若干「突擊隊」，每隊各有其工作。最近政府訓令，每隊分配一定之面積，在耕種季內，各隊須負責處理其範圍內之一切工作。如因地方情形的需要，在某期限內，可以組成若干專門突擊隊，以從事專門工作。各隊可向經理部領得各種必需物品，如用具，家畜，機器等等；此等物品歸入集體農場之財產，各隊負有保管之完全責任。經理部委任之隊長，爲每隊之首領，負責支配全隊工作。隊長之收入，直接倚靠其本隊之生產。

為增加生產總量起見，所有集體農場，幾完全採用散工計算法。通常每隊有特定之工作，隊長將之分配於隊員，或由個人，或分數組負責處理。政府明禁以金錢為工作之報酬，只能計算工作之日數。根據此種目的，將所有工作，分成極易，輕易，難，繁雜（需要專門智識者）與專門等五類。每日工作成績，按照其性質，分別依二分之一，四分之三，一，一又四分之一，與一又二分之一工作日計算。通常每五日計算一次，將各日工作之成績，記入工人帳中。但有數種例外，取乳女工之工作成績，每日登記一次，家畜集體農場工人之工作，則每月結算一次。工人工作之屬於副業者，其報酬不得多於生產工作者所得的百分之七十五。行政人員登記之日數，通常不能超過集體農場工作日數百分之三。各突擊隊中，向無將全隊工作日數平均分配者；個人能力，及隊員之勤勞，均加以計算。每隊員分發工帳一本，以登記其工作。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二日政府訓令：「收穫開始以前，每集體農場必須將工帳所登記之工作日總數，及每隊員之工作日數，結算清楚。工帳至少每五日登記一次，不准延遲」。

蘇維埃當局雖極努力於集體農場工作之編制，冀使工作日數得到精確之計算，但工作日數之計算，及散工

工資支付原則之應用，發生不少困難。集體農場中央聯合會主席達達耶夫 (Tadajev) 在其呈蘇維埃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之報告中有謂：「集體農場突擊隊農作工人間之工作，質量兩方面，實際上無甚分別，而一隊工作日總數，則并不按照人數平均分配」。據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農業委員會報告，集體農場百分之七十已領有工帳，而依法作有恆之登記者，僅佔百分之六十四。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蘇維埃聯邦與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集體農場運動負責官吏分頭報告，謂迄現在止，散工計算法之施行，收效極微。同年年底，農業委員會公報中有謂：「吾人必須承認，大部分集體農場之工作組織，仍未妥善。」

集體農場收入分配所發生之困難，亦同樣可驚。在普遍集體化之初期，并無分配產品之統一制度。就一般情形而論，產品之分配，係以「需要給養之家口」為根據，換言之，即根據每農作工人之全家人口；有時祇以工人數為計算之標準，而附以家庭津貼。此兩種制度，與俄國農場相沿的習慣相同，從前鄉村公社 (Mir) 財產之分配，非根據於需要給養之家口，即以工人數目為標準。殘廢工人，或其他不能工作而自行擁有土地者，常從城市遷回故鄉，倚賴戚屬以謀溫飽。普遍集體化之初

期，官吏極少反對以家庭人數為根據之分配制度；但在此種制度之下，集體農場漸有退化成為純粹消費者組織的危險。失業及季節工人，成羣結隊，由城歸鄉，於是各集體農場之工人，均希望能供應其多數戚屬。同時，此制度并能減殺工人增加個人生產之興趣，故不獨使市場生產之供給，蒙受打擊，即集體農場之有利的生產，亦受不良之影響。計劃以工資及工作為分配產品之根據，如以工作日數為計算之標準者，最初亦曾失敗；因許多農民將之變為一種以家庭人數為根據之制度，在可能範圍內，將工作盡量分配於家人，且設法延長之，此外又製造不正確之工作登記也。一九三一年六月十日真理報載：「多數集體農場工作之分配，常由每人駕駛耕犁」。政府對付此種弊端，係採用工作組織之劃一方

法，計算所成之工作，又工作程序之分配係以工作日數為根據，工人工作之質與量，均加以計算。

一九三〇年七月十二日，一九三一年八月二日與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三日三次政府訓令，關於產品分配辦法，有如下之規定：於集獲總量中，每工人分得穀物及其他產品之一份，以供消費，飼畜及零用。消費的產品分配如下：(1)集體農場須履行契約，先供給定額產品與國家；(2)集體農場在種子專款中，除出百分之十至十五

以爲種子購買費(根據增加播種之計畫)，及種子準備金；(3)設立津貼專款，按照國家規定之比率津貼工作人員數甚少之家庭，教師，農業專家，獸醫，集體農場之專門工人，季節工人及其家庭；(4)所餘部分，則根據工帳所登記之工作日數，以質量為比例，分配於集體農場之農作工人。

飼料分配辦法，亦屬相同。根據合同，減去徵收之量數及除出集體農場家畜之需要與貯藏準備外，所餘即以工作日數為比例，分配於家畜所有者。無家畜之工人，可得到現金的分配。

集體農場之現款收入分配如下：減去租稅，保險費與償還貸款後，所餘部分(1)舊集體農場除出百分之十五，一九三〇年十月後成立之集體農場除出百分之十，爲購置機器，家畜及建築農場新房屋之專款；(2)按每人併入集體農場財產之比例，以百分之二分配於農作工人；(3)以百分之一·五爲紅利專款，獎勵優良的及工作敏捷的工人與隊長；(4)以百分之一又四分之一補助工人之入校受課者；(5)以百分之二爲文化基金；(6)所餘現款(即現款總收入減去生產支出及以上各項分配)以工帳登記之日數為比例，分配於集體農場之工人。

根據現行訓令，一年工作進行之最後分配，必須於

一月十五日以前完成。南方各區域限於十月一日，全國其他各地限於十一月一日，農作工人必須呈報集體農場收入之概算及其自己應得之數額；然後有權利享受報酬，此項報酬約合其估計應得數額的三分之二。

普遍集體化最初二年之實施，與政府法規及命令所定之方法，極不相同。多數集體農場之贏餘分配，實際上係根據人數而非根據工作日數。農業委員會委員亞科夫勒夫 (Yakovlev) 與人民委員會主席毛洛道夫 (Molotov) 在蘇維埃聯邦及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十二月會議中，分頭報告，舉出許多違犯法規之事件，謂藐視穀物徵集令之事件，屢見不鮮。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三日，農業委員會經中央執行委員會批准，公佈命令，規定產穀區域須將收穫總量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按照一定價格，強迫售與政府。命令中雖有「收穫總量所餘之部分（穀物與其他產品），任由集體農場自行支配」之語，但共產黨與蘇維埃政府之他種法令，則剝奪集體農場農作工人之此種權利，實際上剩餘產品除售與國家外，無售與任何購買者的可能（組織法第七條）。一九三二年五月六日，十日與二十日數次命令發佈以前，情形大略如是；在某種範圍內，此數次命令恢復農人自行處置其生產品之權，茲分析之於下。

實際上，大部分集體農場均先計及如何供給其農作工人之生活，如何飼養其家畜；購買種子專款及種子準備金之籌劃，蓋屬次要之事耳。必須在此等責任完成之後，彼等始供給穀物與國家。其所以不願以穀物售與國者，蓋由於市場上能獲得較高之價格，尊重國家優先購買權之失敗，使政府於一九三一年加徵稅款；又就一般情形而論，以家庭人數為根據之每年工作程序分配，引起政府撤換集體農場及集體農場組合之領袖，甚且逮捕及流放農作工人。

根據法律規定，集體農場農人可在十二月一日，先支取其應得分配三分之二，餘數則在一月十五日領齊；但因穀物之交納，往往延至十二月，致引起當局反對集體農場在完了其對國家之義務以前，先期支付其盈餘，因此事之關係，情形乃更複雜。結果，十二月一日集體農場支清其規定的預付者，只有百分之三十二，而作一年工作程序最後之規定者，只有百分之七·四。

除行政的與紀律的法令外，政府最近採取含有經濟性質的步驟，其目的在增加集體農場之生產，與加速穀物之徵集。例如：一九三二年五月四日政府命令，私有家畜與家禽，公有及私有家畜家禽售賣之收入與養蜂之收入，均免除一切租稅。田畝圍圃生產稅，亦行低減。



普通土地稅，減至阿爾特總收入百分之三十五，但耕社總收入百分之五，而集體農場農人之所得稅，已不復超過其個人收入百分之十七至十八。

此外，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發佈之命令，又恢復集體農場（一九三二年二月四日令）與農人（一九三二年五月六日令）自由售賣產品之權。繳納一定之徵收額與國家後，即可在鄉村城市間自由售賣剩餘的產品。同上兩機關之其他命令，准自營及集體農場之農人，以普通市價，在市場上出售家畜，肉類（五月十日令）及其他農產品（五月二十日令），惟如係穀類，則須先繳納國家徵收額後，始能出售。集體農場與集體農場相合，亦可在市場上開設商店，以發售農人之產品。商人（非生產者）之買賣或寄售農產品，仍然加以禁止。

總言之，一九三二年五月六日與十日兩次命令，使集體農場之穀類，家畜與肉類之徵集，大為減少。穀類徵集量之減少，將及百分之二十四，家畜與肉類之徵集量，則較去年減少一半。

### 施行集體化最初兩年之結果——一九三一與一九三二

因集體化之進行，農業生產之通盤改革，隨之而起

。集體化開始以前，全國共有農場二千七百萬，一九三一年年底，已集體化者，超過一千四百萬。集體化農場，已成蘇維埃聯邦農業之主要形式。以前由散漫地塊組成之農場，超過總數之半，今則轉變為二十萬個集體農場，至若集體農場之分成許多部分，純然係由於技術上的原因。

同時，大部分集體農場，均放棄舊日不經濟之三部輪種制，而採用五部或七部輪種制。集體化之結果，收穫與耕種方法之機器化，應運而興，而肥料之使用，一般的選種，抗寒種屬之選擇，亦均迅速增加。國家給與大宗津貼，以為此等新專門用具之資本。為適應需要起見，現有農機製造廠大加擴充，而新廠亦同時設立。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集體農場及牽引機站所用之牽引機，約達四萬四千四百架，與五十二萬〇四百匹馬力相等。一九三二年一月，兩者分別增至六萬一千三百架及八十三萬三千匹馬力。此外，一般農業，尤其是集體農場，現已備有不少打穀機及其他複合機。一九三〇年，供給集體農場使用之複雜農機，價值二萬六千四百萬盧布；一九三一年增至四萬五千萬盧布；一九三二年，據謂能增至九萬萬盧布。一九二七年每三千七百海克他，平均有一十四匹馬力之牽引機，一九二九年每二千八百海克

他，一九三〇年每一千六百海克他，一九三一年每七百海克他，即有一架。每一海克他耕地所有農機與農具之價值，一九一三年為七·七盧布，一九三一年則為十七個盧布。

然因缺乏資本之故，集體農場之需要，只得到部分之滿足。牽引機佔機力與畜力之用於牽引者之比率，初時增加甚緩。一九三一年春季，耕地總面積九千六百萬海克他中，用馬匹耕種者，佔八千萬海克他。複合機之應用，比較上仍屬甚少。一九三一年用複合機耕種者只佔總面積百分之三，但希望於一九三二年，能將其比率增至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六。

最初兩年較重要之事實，厥為全國生產工具，在合作基礎上，合資經營。因耕犁，收割機及牛馬之充分的及較為合理的應用，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一年與以前地畝散漫不用機器馬匹私人耕種時相較，大部面積，已獲得適當的耕種。牽引機與複合機誠然尚非蘇俄農業之主要特點，但最低限度，集體農場中已不復見鋤耙，木犁之存在。據數字所示，一九三一年集體農場一匹馬能耕地五海克他，而自營農場只耕二海克他；又集體農場每一耕犁所耕之面積，較自營農場大二倍。

集體農場領袖根據歐洲人的經驗，鼓吹肥料之大量

的應用；俄國農事試驗場所得之結果，證明應用此種方法，足以迅速增加生產。歐戰前俄國農業所用肥料，約為二百五十萬坤特爾。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九年間，其消費量尚屬甚低；但一九三〇年，集體農場已需用至六百六十萬坤特爾；而一九三一年之計劃，且擬增加過磷酸鹽，石灰燐酸，鉀，與硝酸鉀肥料至二千四百萬坤特爾，約合戰前之十倍。此計劃不能完全實現，主要原因，由於運輸之困難，但無論如何，肥料之消費，實已增加甚速。

集體化第一個經濟的結果，厥為耕地之大增。因取消零星地畝與界渠，國家土地之授與集體農場，採用牽引機耕種與前此不能應用之集合耕種法，及開墾前此為遊牧人民，沼澤與曠野所佔據之土地之結果，一九三〇年與一九三一年耕地面積大為增加，下列數字，足以表明（單位百萬海克他）：

	耕地總面積	集體農場之耕地面積
一九三三	一一六·七	一·四
一九二八	一一二·九	四·二
一九二九	一一八·〇	三八·三
一九三〇	一二七·八	八〇·一
一九三一	一三六·六	

根據上表，可知耕地面積，一九二九年增加百分之四·五，一九三〇年則增加百分之八。一九三一年計劃預定，將耕地面積擴展至一萬四千萬海克他。此計劃未能完全實現，但已增加百分之六·二。

初秋開耕，已極普通；在此時期開始耕種之土地，一九三〇年為二千四百萬海克他，一九三一年則為三千五百萬海克他（其中二千六百萬海克他屬於集體農場）。目今機器與牽引機，已屬非常重要，利用機器播種之土地，一九三〇年為二千八百萬海克他，一九三一年為二千九百三十萬海克他；而初秋播種利用機器者，則一九三〇年為九百萬海克他，一九三一年為一千三百萬海克他。

集體化之第二個重要的結果，為各種穀類種植的比率之全然變更。消費作物之生產，勢趨低減，而市場產品，則反呈增加。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年間，小麥生產，增加百分之十八，而裸麥之生產，則減低百分之七或百分之八。

第三，許多農場之有系統的與部分強迫的採用較有效的方法，及輪種法之普遍應用，將俄國農業加以改革，工業原料生產品因而增加，下列數字，足以表明（單位百萬海克他）：

	工業原料生產總面積	集體農場工業原料生產面積
一九一三	一〇·二	—
一九二八	八·六	〇·二
一九二九	八·八	〇·四
一九三〇	一〇·七	四·四
一九三一	一三·五	七·七

種植亞麻面積，一九三〇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一九三一年更增至百分之三十五；產棉面積，一九三〇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五，一九三一年，增至百分之五十；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年間，糖蘿蔔種植面積增加百分之六十，向日葵種植面積增加百分之三十八，烟草種植面積增加百分之四十。

機器化與應用現代方法收穫之效果，極不明顯。農民委員會委員亞科夫勒夫在其一九三一年十月六日之報告中有謂，一九三一年豐收之希望，并未實現。屠勒節科夫 (Tal'kov) 教授在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七日真理報發表一文，謂「社會主義穀類生產制度之組織，雖有鉅大之成功，惟此問題之他方面——此制度之生產，尤其是有常的及大量的收穫——吾人仍不能自翹」。

一九三〇年與一九三一年之計劃，包括一每年收穫

由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三十五的增加。理論上，固可預料集體農場之收穫遠較自營農場為大，因前者係應用較現代之方法也。然而此種臆測，不能立即證明，投資與技術的改進，仍未能達到預期之結果。泰半因氣候關係，一九三〇年之收穫，雖較一九二九年為佳，而集體農場之一般情形，固與自營農場無異。根據官方宣佈之數字，每海克他之出產，約為八·五坤特爾。一九三一年全俄每海克他平均產量，尚未公布；然而各集體農場及各區域之紀錄，顯示每海克他出產增至一〇·一坤特爾之計劃，仍然未能實現，平均生產量，甚且未能達到一九三〇年之數。根據蘇維埃政府公報，生產量低減之原因，係由於春秋兩季播種之過晚。「早晚播種所得之生產結果，有極大之分別，因延期播種之低量的生產，能使已耕面積之小麥收穫總量，大為減少……」播種面積增加，與播種工作不完善之結果，一九三〇年及一九三一年夏冬兩季播種，顯然較往時為遲；秋季播種之一部分為嚴寒所傷，而春季作物之種植則時期過短。故農業委員亞科夫勒夫在其十月六日之報告中有謂：「集體農場之收穫，全不豐足」，「一九三一年集體農場之收穫，與自營農場相較，不能多於百分之十或百分之十五」。因耕地面積增加及氣候適宜之結果，一九三〇年穀

類及工業原料之收穫總量以與一九二九年相較，大有增加，下列數字，可以表明（單位百萬坤特爾）：

穀類	集體農場	自營農場	棉花	糖	蘿蔔	亞麻
總產量	1213	816	—	78	1020	85
穀類生產量	228	733	—	91	222	1100
總產量	292	774	—	71	86	615
總產量	250	874	—	30	135	517

一九三一年俄政府計劃一更大的增加。根據此計劃，穀物生產總量為九萬七千八百六十萬坤特爾，而集體農場則佔四萬二千二百九十萬坤特爾；棉花總產量為二千一百萬坤特爾；糖蘿蔔二萬一千四百萬坤特爾；亞麻五百六十萬坤特爾。然而事實上，所有此方面之紀錄，均足以表明一九三一年計劃中百分之十二的增加，並未達到。根據提出於蘇維埃聯邦共產黨第七次會議，與一九三二年二月之共產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會議之各種紀錄，一九三一年收穫總量，可以估計如下：穀類七萬八千五百萬坤特爾；棉花一千二百六十萬坤特爾；糖蘿蔔一萬二千一百萬坤特爾。此種數字，低於一九三一年計劃中之規定，且較一九三〇年之數字為低，但較集體化以前之數字，則顯然增高。

化體集業農之俄蘇

據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二日真理報載，一九三〇年平均播種面積，集體農場中每一農場為五·五海克他，而自營農場則只有二·七海克他。集體農場之剩餘穀物較自營農場大二倍。

集體化最初兩年，市場生產品供給之增加，亦顯而易見。一九三一年，北高加索集體農場每海克他出產之運銷於市場者，為一·七坤特爾，自營農場則只為一·四坤特爾；烏克蘭每海克他運銷市場之數量，集體農場與自營農場成一·九六與一·三九坤特爾之比；克里米亞 (Crimea) 為二·三與一·五之比；科爾加希慈共和國 (Kirghiz Republic) 則為一·五與一·〇之比。一九三一年，國營農場 (Sovkhozy) 與集體農場運銷市場之穀物數量，與戰前大地主及富農所售出者大致相等。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之共產黨雜誌布爾希維克 (Bolshevik) 載有一關於穀物銷售之極饒興味的統計表，表明各種農場剩餘穀物分配之百分比。

國營農場	集體農場	中小農場	富農農場	大地產	總計
一九三	—	三六·四	五〇·〇	三二·六	一〇〇·〇
一九六	一·〇	四四·〇	一〇·〇	—	一〇〇·〇
一九五	二·三	一〇·五	四〇·〇	—	一〇〇·〇
一九〇	六·四	四四·一	五〇·〇	—	一〇〇·〇
一九一	一〇·〇	六二·〇	三三·〇	—	一〇〇·〇

據上表，可知一九三一年國營農場與集體農場運銷於市場之穀物的比率，與一九一三年富農與大地主銷售之比率相等。

一九三一年，國家徵收穀物總量達二萬二千九百三十萬坤特爾，以與一九二三年之七千三百萬，一九二八年之一萬零九百六十萬，一九二九年之一萬六千二百六十萬及一九三〇年之二萬二千五百萬相比，均屬較大。徵集數量大至如此，以致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冬季，烏克蘭，烏拉爾 (Urals) 及窩爾加平原 (Volga Plain) 等地，穀物均感不足；因該地在一年內，徵集量之增高，在百分之五十五至百分之一百之間也。

集體化之於鄉村過剩人口問題，亦曾引進新的要素，鄉村人口問題之在俄國，自來即屬非常重要。經濟學家對於過剩人口之估計，各有差異，大概約自九百萬，一千二百萬，以至一千八百萬之間。人口過剩，通常為軍隊招募失業者之主要原因。此種情形，大戰之前，革命以後，均有同然。但集體化之施行，已將昔日習見之因鄉村失業人口擁入城市，以致勞工供給過剩之情況，加以改變。集體化運動開始時，即有人臆測，集體化與農業機器化及合理化同時並進，將足以增加鄉村過剩人口，及增多鄉村失業者於城市。此種臆測已為集體農場

中央聯合會之報告證實，該報告謂：一九三〇年受雇於集體農場之工人，平均男工僅及百分之四十至五十，女工僅及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五。根據集體農場研究院之調查，一九三一年集體農場雇工人之比率如下：四月至六月，男工百分之三十八，女工百分之二十三；七月至九月，農忙季節，男工百分之七十七，女工百分之七十一。故可云目今鄉村人民之能工作者，半數以上不能在農場中獲得相當職業。農業委員會之調查，亦可得到同樣之結果，據此調查，一九三〇年間，集體農場平均只能供給農作工人以一百日之工作，夏季每月，甚至未必能超過十四日至十八日。目今較為有效的耕種方法之逐漸採用，工人之需要較多，鄉村農業生產之擴充，遲早亦須吸收更多之工人；但個人工作登記之精確方法的實行，與機器化之發展，將來鄉村過剩人口之更為增加，蓋可預測也。

此種不能盡量雇用農作工人之情形，將必增加鄉村失業人口，似可預料，但實際上之結果，則迥異其趨。集體化以來，謀業工人與季節工人（農人向城市尋求暫時職業者）之自動赴城市者，已大為減少。此種趨向，或可以貧農多留鄉村解釋之，以前貧農常為構成多數城市失業者之分子，目今則居留鄉間，希望集體化能使其

獲得較優之生活。此觀念足以阻止工人流入城市，蘇俄政府為獲得新礦場，工廠所需工人起見，不得不採用強制辦法。集體農場奉政府訓令，撥出定額無專門技術之工人，以供工業之用。同時集體農場工人之謀季節職業於城市，及集體農場之供給工人與工業者，可以享受各種特權。又集體農場必須供給定額之季節工人，如不遵令，則以罰金為恫嚇。茲為篇幅所限，關於農業人口過剩問題，不能詳細討論，惟上文所舉之事實與數字，足以闡明此問題之在俄國，經時以後，必極重要。

(譯自本年九月份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 紫外光使紅蘿蔔色素變成維他命A

紅蘿蔔中的黃色素叫做Carotene，這種色素遇着波長2650A.U.的紫外光就變成維他命A。維他命A能吸收紫外光，所以我們能知道Carotene是否變成維他命A，並且用氯化鋁也可以試驗出來，因為維他命A遇着氯化鋁有一個特別的顏色。這個現象是劍橋大學的Bowden和Snow所發現的。

# 嘗試與錯誤

## ——研究科學的態度

W. L. Severinghaus 原著  
陳 孚 華 譯

熟讀科學進化史的人，一定知道科學的進步是由於不妄自臆度不固執偏見的實驗。用這樣的方法得到實驗的結果，由這結果推測出基本的原理與原理。若更深入研究，有時會發現最初所認為對的原理不圓滿或甚至於完全錯誤。有時會有幾個互相抵牾的原理同時發生。當應用在一個問題上時，用這條原理時必需把那條忘掉，用那條時不能兼顧這條。這一種情形，已經經歷了幾百年的時間而對於事物的本性還沒有得到完全的認識。這種事實很能够使科學家氣餒而發出「知識有甚麼價值」的嘆息。

在紐約一個公開演講中，我聽過 John Galsworthy 的演講，他說大凡在解釋一個問題中往往會引起另一問題較比先一問題更複雜更難解。他說像「鉛管裝置問題」便是一個好例子。在大城市中，水的供給與垃圾的清除是件難辦的事。後來這個問題得到解決了，使五十層的高樓與分租的房屋得以建築；但是因為這個問題解決

了却又引起一個大問題，因為城市的人口大增加，交通擴充到地底，這「地道問題」較比「鉛管問題」更棘手了。

有一個學生當下物理課後忽然對我說：「我現在很覺失望，我放棄了社會科學因為我覺得牠的理論太乏味，這個人的理想和那個人的一樣不澈底，我希望能够在物理學上找到一個最後答案，但是你方纔對我說物理學上有許多問題至今無法解釋，並且物理學者的見解亦互相分歧」。這的確很容易使學者感覺失望，這篇文便是要討論這個問題，凡是經驗過這種失望的人一定對牠更感興趣。

在美國一個最大的生物學與地質學的實驗室的大門上刻有一句名言「求於地，彼將告汝」，驟然看見這話似乎很能使人覺得有希望，但是不久問題便會發生：「如此的大面積，何處去求呢？」「地的耳在什麼地方呢？」「應對地說那種話呢？」。於是便有許多人說，「地並不能告訴我們甚麼。」「學者應該靜靜的坐下用冷

靜的邏輯學來想像萬物」。我現在的目的就在證明地雖然有時會使人失望，但是孤癡的邏輯更能使學者失望，不過這兩種方法雖然都不能達到真理，但是學者總能夠在這兩種中找出一種比較成效多的。

知識能逆料到世界上許多有趣問題，人只要有了好奇心自然界便是一個取之不盡的實驗室，而在發見一個新現象時總能得到一種莫名的快感，所發見的現象也許並不是新的，但是因為牠的發現是個人觀察的結果，所以總覺得愉快。

就我個人的經驗，我可以舉幾個簡單的例子來証明以上的話。有一次我正從窗戶望外面種的薄荷花，忽然我注意到牠的莖的橫斷面是正方形的，這似乎很奇特。並不是因為我知道牠的莖應該是圓的，而是我不知道為什麼牠是方的。不久我在筵席上遇着一個植物學家，我問他這樣的植物多不多，他的答覆很使我吃驚，他說這樣植物大概有一千多種，薄荷科的植物都是這樣。我隨即問他這樣植物如何生長，他的細胞是否都是方形的晶體？他答道這次你算是問我一個真正問題，因為這個問題很複雜，須要長時的討論。

當我在 *Cande-Cod* 時我最喜歡把麵包屑投給鳥，看他們怎樣吃，這些鳥大半是麻雀，小麻雀不斷地向大的

要食物，但是大麻雀似乎不大理會。有幾個小雀漸漸長大，一直到他們的身體竟比他們的母親大好幾倍，那時我才知道他們並不是麻雀而是黑鳥。於是我便去參看一本關於鳥類的書，原來這樣的黑鳥最喜歡把蛋生在麻雀窩裏，使麻雀替他的小鳥養大。

再可以舉一個例子便足以証明求知於大地的效果。有一次我們在海濱上日光浴，有一個同伴忽然驚奇的叫道「看這個」原來是一個淡綠色的貝殼，在這殼裏有十個拳頭大小完全相同的貝殼。我們把牠拿到 *Wood Hall* 去請教一個生物學家。他說「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標本，我要把牠帶到課堂裏去，今年夏天他們找了許多時候沒有找着這東西。這是一種腹足類的螺，名字是 *Buysch Conicatum*，又叫作海蛾螺。這堆的殼大概已有一個多月的生命了，普通每個殼裏有十個至十二個的貝殼，每五十或七十的殼連成一串，每個小殼裏都有一個生物，先是卵變成蛹，蛹發出殼膜造成殼」。你可想像而知在他發表這短短的談話以前要同大地說多少話。

以上種種的例子足以証明我們和自然接談是多麼容易多麼簡單。要知道所謂現代科學不過是大地在我們睡眠前講的催眠故事而已。

再看一個更圓滿的例子。「什麼是光？」這個問題



的歷史很長。Al-Hazen, Roger Bacon 都忽略了這問題而認為無研究價值，一直到人們對於光的行為有具體的觀察，才知道光有以下種種的性質。

普通的日光當經過三稜鏡後則分為許多不同色的光線，這些光線可以再合成原來的日光。

光經過密度大的物體較經過空間為慢。光經過玻璃時之屈折與光在空氣中及在玻璃中之速度有一定的關係。

光在空間中之速度為每秒十八萬六千英里。

一條光線經過方解石之晶體後可分為二條光線，若將晶體切成特殊形狀，而該一部光線完全隔斷則另一部光線可以似乎不受阻攔地透過。

太陽光景有一定之黑線在其間，其位置與某種氣體發光時出現之光線(Bright lines)相符合。

兩條顏色相同的光線，混合後可成黑暗。

光經過磁場時有相當之影響，光由遠處之星射至地球當其經過地球時向日偏倚。

某種光照在帶負電的物質上時能使之失電荷。

這些事實的發現花費了三百多年的工夫，而歸功於幾個名字永遠燦爛的發明家，如牛頓 Newton 海金 Huygens, Roemer, Young, Fraunhofer, Faraday, Foucaults,

Moxwell, Hertz 等。牛頓與海金同時都是大實驗家又同是精於哲學與邏輯。牛頓由他的觀察斷定光含有分散的細粒。同時海金斷定光是一種波動。當時的科學家都附和牛頓的主張，因為牛頓說他從來不會錯的。那時誰敢和偉大的牛頓爭辯呢？百年後 Thomas Young 做一個極有名的試驗，關於光的干涉現象。於是羣衆的意見才不得不離開牛頓而轉向海金。因為牛頓這樣說過須認為這樣對，這是一種不健全的科學態度，他們忘掉知識是來自大地並非來自牛頓。到後來漸次所有的人都堅定的認為海金學說是对的，光是波狀并非質點，因為有許多試驗結果非用波動說來解釋不可。於是乎科學家重新固執起來，每逢有說波動說不合於某種實驗的，他們便堅決的反對。

最近二十五年來關於放射的研究範圍增廣，因之又引進一種類似舊時質點說的理論，同時在另一方面又需用波動說。其結果是科學家們要削足適履地認為光是由小包所組成的，每包中充滿着波。波動說非但沒有丟去而且擴充範圍，現在甚至認為電子與原子的本身都是波動的，雖然同時他們亦是質點的。因為實驗證明原子與電子因受晶體之影響而偏倚的現象與光或 X 光線完全相同。最後你一定以為經過三百年的探討應該可以得

到「最後答案」了。不，完全不然，我們不敢希望得到最後的答案，我們不過得到「一個答案」而已。我們對於光的認識還不能夠給我們一個最終答案，或者我們將永遠得不到，因為我們似乎不能夠把整個宇宙化成一個簡單公式，試驗者愈費心探討，問題亦愈複雜。

你如果固執着要求得一個最終解答，你便會感覺得一切的問題都是在黑暗中，似乎我們永遠捉不住答案。但是你要知道我們的任務不過是繼續的向大地求知識，求簡單的求複雜的知識而已。這神秘主義與某種哲學家常有要得這最後解答的野心，但是在自然科學上似乎是已經斷定這種野心是不可能的，如果能夠把這個基本觀念明瞭後一定可以把許多人對於科學的無意識的崇拜除去。普通人總以為科學所說的不但是對而且是永遠對的，這種思想是一個根本的錯誤，而且是不科學化。

至於因為研究「光是什麼」而得到的附產品，那直是多得一部百科全書亦記不完。我只要說其中的一二够了，我們因此得以針探星的內心，我們因此得以聽試牠的脈搏，牠的溫度，我們因此得知顯微鏡下微生物。我們因此得知怎樣收發無線電波，我們還知道許多別的東西。我們同牛頓一樣不知道答案的全部，但是綜合現在我們所知道的，當時牛頓做夢也想不到哩。

用非常謹慎，非常見長而有計劃的實驗來考求各種事實，有時所得的結果是洽如所望，但有時會得到不可思議的結果。更深入研究有時且能證明以前的解釋之錯誤，而同時現時的解答亦不健全，這無數次的嘗試與錯誤的結果已經使我們對於自然有相當的明瞭，而對於人類的幸福有極大的貢獻。

一八五九年Ogden Root就職於Troy大學，在就職典禮中他說了一段故事，這段故事便可以闡明科學是需不斷的實驗的。在十九世紀的初葉，學者對於光學極感興趣，對於光學的儀器亦大有進展，但當時所用之顯微鏡仍是粗糙，直至一八四〇年英國光學家增加鏡的孔縛角Angle of aperture至一百三十五度，使鏡下物體得感到充分之光。當時有光學專家 Mr. Rose 說由光學上看起來不能使孔縛角大於一百三十五度，所以無法使顯微鏡更精確。一八四六年紐約的Gillman博士藏有一個當時認為最精確的法國顯微鏡。有一天他接見一個拓荒的人，這位客人要求要看他的鏡子，博士允許了。他拿起那鏡子左轉一下右旋一下，考究了半天，直到博士怕他弄壞了鏡子，他才說「我能夠做一個比這更好的鏡子」，博士十分藐視地說：「甚麼？先生，如果你真能夠作一個鏡子比全法國最好的鏡更精確，你一定會發一筆

財」。後來博士把這段事告訴給他的朋友，大家都笑這人狂妄。六個月後，一天早晨博士忽然接着一個由村中寄來的顯微鏡。他竟把鏡的孔罅角由一百三十五度增至一百七十八度。從此後英國的光學家都被推翻了，接着發生許多的紛爭。不過 Ross 他雖然被一個不像科學家的朋友所侮辱了，但是他並不引以為恥。這人原來是 Charles A. Spencer，他後來成立一個鏡頭公司在 Buffalo, N. Y.

照這種方法來研究事物，不但自然科學的種種問題可以解決，便是甚至於社會科學以及宗教問題亦都要迎刃而解了。

Plymouth, Massachusetts 是美國的策源地。當時只有極少的幾個清淨教徒在那荒蕪地的海濱立一個共和國來享受宗教上的自由，他們立刻覺得有許多困難阻止他們的試驗。在第一年他們遭到意外的失敗，這一個組織竟漸漸衰落下去，但是他們仍是繼續奮鬥，要努力把他們的理想實現起來，他們繼續實驗，雖然不斷的有許多錯誤發生，他們經過無數的悲慘失敗，但是仍舊不氣餒。一直到今日果然 Elder Brewster 與 Miles Stan dish 等的夢想都一一實現了，不但實現了，而且比他們所希望的更圓滿更富麗。

我還知道許多的例子可以用來證明我的實驗主張的重要，只要對大地誠懇的，聰敏的，忍耐的去求他，不要認為所得的結果離所希望的太遠而失望。因為這樣結果——所謂「相反結果」(Negative Result) 是很重要的。雖然這樣相反結果最容易使學者氣餒，但是他能夠指示你所應該走的路與所不應該走的路。

讓我們舉一個例證明相反結果的用途。在研究光的過程中，在一八八六年有一個極有名的實驗，便是所謂 Michelson-morley miller 實驗。這實驗的目的是要求地球在空間的絕對速度。他所用的儀器極其精確，但是他們得到的結果雖然不是完全相反，與他們的預測却相差遠甚。這個結果當時沒有人能夠解釋，可是二十年後竟變成了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上的一個基本原則。

再舉一個民治上關於「相反結果」的例子。在最近紐約 Evening post 報上有一篇關於 Nathan Hale 的論文，先敘 Hale 的小史。說 Hale 從耶耳大學畢業後投入軍隊，隨軍到紐約，因為替華盛頓探英國的軍情使投入英國軍隊當奸細，後來事情被發覺了，竟被處了死刑，死時年才二十一歲。最後論斷是這樣的，當我想到 Hale 時我便連想到 Browning 的一首詩「死亡不能阻止工作的前進」(No work begun shall ever pause for death)。

King 的死可以證明失敗是成功之母。雖然對於他的使命他是完全失敗了，當他臨刑時，我想他一定不是悲傷他死的太早，亦不是悲傷他將要和未婚妻永訣，而是悲傷他是失敗了。他心裏想華盛頓一定說他無用，後悔不曾派一個更能幹的人。不過他雖則失敗了，他的死是勇敢的。假使他的圖謀成功了，假使他探出了英國的軍情，假使華盛頓因此大獲勝仗，假使他升做大將軍，假使戰後他做了美國總統，而活著享受令名。這些成功決定不能像死的那樣能激發起我們的同情心。

我的意思並不是在提出問題要求解決，更不是對這種問題供獻任何答案，我不過是希望你們注意以下三點：第一要隨時警覺留意，而不滿於現狀。第二要應用實驗辨別的方法來解決問題。第三要對於實驗結果平心靜氣的考慮，而以此結果為將來試驗的指標。我們無論對於科學對於政府對於教育對於宗教除非採取這種步驟，我們不特將日趨於腐敗，而且將歸於滅亡。我們要放心大胆地去研究新的問題關於社會的連繫，關於人格的修養。

譯自本年十月份 Scientific Monthly

### 用皂莢製肥皂

在內地，尤其是鄉間，肥皂的價格會高到使普通人們使用不起！代替肥皂，他們用皂莢，洗被褥，洗衣裳，甚至於洗手盥面。他們是用天然的皂莢代替肥皂。

他們也許曾經想過，皂莢既可當肥皂用，不是也可用來製造肥皂嗎？

是的，可以，最近在法國已經成功了，用皂莢製造肥皂。

# 國家概念的分析

趙純孝

## 一 導言

全部政治學所討論的問題，自始至終也未逃出國家範圍之外，所以有人以為就認政治學是國家學，也不是沒有道理。不過對於國家究竟是什麼這個問題，歷來許多學者都抱着一種科學家「打破沙鍋問到底的精神」去研究，討論，追根問底，希望得一個極徹底的答案；但是因為人多思維，個人的入手方法及所用工具各各不同，所以關到結果所得的答案也各異。

柏拉圖認為：「國家是應需要而產生的」。亞里斯多德認為：「國家可看作人類自然的本能的生活之結果」。盧梭與活布斯認為：「國家是社會契約所造成」。侯德認為：「國家是人民間因實在的利益而造成的。」宗教家如路得<sup>Luther</sup>等主張：「國家是神造的。」更有人主張國家是由戰爭而來的，孫中山在他的民族主義第一講裏說「國家是由霸道造成的團體，」張懋慈說「國家是由一大羣人民有種種不同的地方：有體格與皮膚方面的不同，也有精神上與別的方面的不同，這種種特別的

情形，又可以把大羣人民分為幾個大類，而加以屬於區別的記號名字罷了」。這種種不同的說法，實在使學者們感到不知誰從的困難，誰是誰非，更不是片言所能辯證，況且國家這個東西，也不是他們幾個學者的幾句抽象的理論所能道盡的，所以要知道國家究竟是甚麼，我們得分析分析國家的概念，我們現在先看看國家這個名詞的來源。

## 二 國家這個名詞的由來

我們知道；在原始時代——人們是以漁獵方法去取得天然食物，他們的生活是與禽獸沒有兩樣，當然無所謂國家不國家。後來進而為族長文明時代，一定農田之佔有，私有財產制度都於此發生，人類社會是在開端發展了，但其結果不過是部落的分化，也還沒有國家的產生。及至進而為商業文明時代，國際交通之開放，國際貿易之發展，都叫人們認識自己與他人之不同，這自己與他人之不同的認識纔是國家之所由生。不過自國家產生之後，人類社會仍在演進，最後纔至近世的工業文明

，利用科學發明，增加生產，集中資本。國家在這進化的途中當然經過不只一次的變化了，國家這個名詞的觀念也就隨之而不同。譬如在希臘古代，國家這個名稱叫作 *Polis*，不過在那時的希臘城市國家生活時代，他的意義所指的範圍非常小。在羅馬的初期也是這樣，他們叫 *Civitas*。後來到十六世紀意大利政治學者 *Machiavelli* 作了一書名曰 *Prince*（霸道），這才把國家的觀念擴大起來，從城市的觀念一變而為全土的國家觀念，現在各國通用的國家這個名詞——就是從那裏來的。饒是這樣現在各國通用的一個共同名詞他所謂的政體意義仍會不同，譬如國家這名詞在英國日本是指帝國，而在美法就指共和了。

### 三 國家與「社會」「民族」「政府」之不同點

人們常把「國家」與「社會」「民族」「政府」混為一談，這是一個大錯誤，我們若要對國家認識清楚一點，我們應把他們的區別寫出來：

#### (一) 國家與社會的不同

國家與社會是不相同的。他們的意義與範圍都相差很遠。第一國家在英文中是 *State* 而社會是 *Society*，他們倆的字形就全不一樣，他們的意義可知。第二，就

他們發生的先後講，是先有社會而後有國家；有國家必有社會，有社會不定有國家，在人類進化的過程上，歷史很明顯的這樣告訴我們。第三，張慰慈說「社會只有人與人的關係，和人在的土地無關，所以社會的成立，不限定要佔據一定的疆土，人民要無一定的疆土，便不成為國家」，是一個很好的區別法。我們若要再明白一點闡明他的意思，即是別的團體在任何地方皆可成立，但是國家是必要先有一定的土地，方能成立的。猶太人遍於世界，但不能稱為國家，也就是這個道理。第四：就範圍的大小說，國家是小於社會的，因為國家乃是社會內的一個團體 (*State is an association with Society*) 所以社會的範圍是世界，而國家的範圍則只限於本國。我們可以同時做社會中很多團體之一分子，但是絕不能同時屬於兩個以上的國家。最後也就是最大的區別是在國家無論對內對外要有一種最高的權力，要沒有這種權力就不成爲國家。換句話說，在國家之中無論任何團體之行動要受國家的法律的支配，與直轄限制，而國家則絕不受任何團體的支配與限制。

關於國家與社會的區別，我們再引兩個人的意見在下面，馬克阿發 *Machver* 會說，「國家不能與基本社會相等，政治團體不能包括人類生活的全部，也不能支配

人類生活的全部。國家不能被認為基本社會，祇能認為在基本社會中間的一個特殊的權力團體。國家是有限制的。是社會生活的一種有限的組織。基本社會是無限制的，是一個無限發展的制度」。

阿爾也說：「國家是什麼呢？家國不過是在基本社會中的統制的政治機關……國家是統制的機關，為基本社會表明公共目的，行使公共行為」。

由此可知國家固然有他最高的權力可支配直轄一部分社會內之各團體，但是他的權力的實施所達到的也就不過是這一部分的人類生活範圍，而不能超過這個範圍之外，所以國家的權力是不能支配全社會內所有的團體的，而自己也不過是一個能支配其所佔有基本社會內的一部分的一切的團體罷了。

### (二) 國家與民族的不同點

國家與民族也是不同的。因為民族是很多人類在一起，有語言，文字，文化，風俗習慣，宗教，遺傳等等共同之點相吸而成為的一個團體。一個民族或幾個民族在一起成立了一個政治的集團據有一定的土地享有獨立的權力方才算一個國家的實現。所以國家是超民族的。

孫中山說「民族和國家是有一定界限的，我們要把他分別清楚，有什麼方法呢？最適當的方法，是民族和

國家根本上是用什麼力造成的？簡單的分別，民族是由於天然力造成的，國家是用武力造成的。用中國的政治歷史來證明，中國人說王道順乎自然。換句話說，自然力便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團體便是民族；武力就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團體便是國家。」

總之，民族是主觀的；國家是客觀的。民族是自然的結合，而國家是一種政治的結合。民族是各國家組成的分子，但各國家不一定由一民族所組成，有的民族無國家。

布爾答斯 Boggs 說「國家是人民的一個政治集團，在一定的土地範圍之內；而民族是一羣人有他的共同文字，遺傳，歷史，習慣，及共同的是非判斷的意志，佔有一定的完整的土地」。

民族是心理的與倫理的信念，而國家是法律的政治的信念。

### (三) 國家與政府的不同點

最後我們要分別國家與政府的不同了。國家是一個最高權力的組合，用一種政治的組織去促進公共的目的與需要。而政府是一個不同的代理者，官長，或機關的集合組織，由他們去規定或實現國家的意志，政府是一個國家的最重要的元素。但是我們要認清他們兩者之間

的分別。譬如說神經系在動物體內是最重要的，可是我們不能因為他重要而即說神經系即是動物的本體。又如一個公司的經理在公司中占最高的地位，但我們不能說這經理即是公司。政府之於國家，也正復如是。不過因為古代並未明瞭於國家與政府的分別，同時也沒有有一定的政府的權限的分割，如同路易十四說：「朕即國家（I am the State）」之語，常時有人用來作政府即國家的錯証。

如果政府與國家沒有區別的話，政府即國家，那麼如果君權被推倒，或是政府的幾個執政者被推倒，國家就要隨之滅亡了。可是事實不然，國家仍然存在。可見政府的組織的興廢，並不影響於國家的存在，所以國家的性質是永久的，不死的，而政府是暫時的會倒塌的。政府常以革命或法律上的手續而更變，國家並不同時因而滅亡。

#### 四 國家的定義與本質

##### (一) 國家的定義

我們既然把國家的產生及他與社會民族政府的不同點說過，我們現在就要歸納起來用綜合的話說出國家的定義來。但對於這一點歷來的學者都有他自己的說法，叫人幾乎找不着一個相同點。

英國政治家赫蘭 Halland 說：「國家者，是佔有一定土地的一羣人，其中大多數或一階級人的意志勢力，足使其餘的人不加反對。」

哈爾 Halland 說：「一個獨立國家的標記，就是這一國內的人羣的組織，建設在一般永久政治目的之上，而佔有一定土地，對外獨立。」

法學者賽德爾 Seckel 說：「一個國家的存立，是由於一羣的人佔有地球表面的一部，而組合在一個最高意志之下。」

哥路普斯 Groenius 說：「國家是一個完全的社會，為一般自由的人民為享受他們的利義與權利而組成。」

威特爾 Vattel 說：「國家是政治或社會上的一羣人為享受他們的幸福與公共的利益而聯合的一個總力。」

布爾基斯 Burgess 說：「國家是一部分特殊人羣的組合體」。

布蘭芝里 Braunschi 說：「國家是佔有一定土地的人羣政治組織」

腓里莫爾 Philine 說：「國家是一羣人民永久的居住在一一定的土地之上，有他們共同的法律習慣風俗而融成在一個政體之下，由他們政府的主權者直轄所有全國境內之人物，並決定國家對其他個團體的作戰與媾和權。」



蓋諾爾 Garnet 說：「國家不過是政治學與憲法學上一個概念，他是由於一羣的人民（可多可少）永久的佔據在一塊土地之上，不受其他國家的干涉，同時具有一個有組織的全民望從的政府。」

洛布斯 Hobbes 說：「當人類的一個羣衆個人與個人合意定約，多數人願意把權利送給一個人，或一個團體，做他們的代表；個個人無論是贊成的或是反對的，都一致的承認這個人或這個團體的一切行爲和判斷，如同自己一樣，以達到自己的平和生活，和防止他人侵害的目的時候，一個國家才可說是建設起來了。」

從上面這些定義看來，各學者的說法雖各不同，但若撮取其中心思想，國家不外是一個有組織的人羣，他們占有一定的土地，享有獨立的主權，並有一個爲這羣人圖謀公共福利的機關，就是政府。

(二) 國家的本質

就從上面的定義裏邊，我們找出幾個主要的組成國家的原素——(一)爲共同利益而結合之羣衆，——人民。(二)佔有一定土地，在這土地上各有其居所，——土地。(三)獨立存在不受任何其他國家之干涉與侵犯，——主權。(四)有一共同最高權力的組織，去表現或實行全民公共的意志，——政府。

1, 人民——「國無民不立，民無國不存」這是中國兩句形容國家與人民關係的古語，我們從這兩句話裏可以看出「國以民爲本」。

人口的多寡不用說是與國家的發展大有關係。人口之增加，才有國家的產生。後來因爲有人口的增加，一方面纔有工商業的進步而有今日的文明；另一方面人類纔紛爭不已，因爲人類之紛爭不已，爲作圖存的計畫，國家的觀念愈深入心中，國家的立場也愈穩固。

世界各國對於本國的國民，皆有很詳細的調查，一則爲謀公共之安全與幸福。同時可考察本國民族生死的比率。

他們所用的方法是(一)定期統計 Period System.

(二)隨時統計 Singular registration。英美每十年統計一次，法德每五年統計一次，於全國的各行政區域設立永久的註冊機關專司其事，唯如此人民的生死存亡國家始得以確悉，方能保護人民的權利增進人民的幸福，譬如對於教育行政諸方面，都便於規定設施標準。

2、土地，——一國的土地有廣狹兩種說法，前者是指國家的一切物質環境，國之大小位置，無論他爲水爲陸，以至於氣候及自然環境都包括在內。後者則不過是一國在政治上所管轄的一定的境地而已。

人民對於國土有永久的佔有，方能保持其國家之存在，主權之行使，因此獨立的國家之領土，是絕不受任何其他國家之侵犯的。譬如猶太人散布於世界而沒有一定的國土，便不能稱為國家。因為一則要有土地，方有一切供給立國的物質富源，再則物質環境對於一國國民有極大的關係，可以影響人民之多少，指定國人的職業，同時與政體也很有關，譬如平原地以農立國的則易趨專制及封建制度，商業國則易為平民政體，所以一國的土地不特影響到他的風俗及道德觀念等，並且會直接影響他自己的進展。

3、主權——是一國最高的統治權力，對內則對於國內一切人及事物有絕對的管轄權；對外則完全獨立，不受他國之干涉，與侵犯。現在且將幾位學者對於主權的意見介紹如下：

Hugo Grotius 說「凡行為不受別人的意志或法律支配的權力，叫作主權」。

布丹說：「主權有四個特性：（一）最高性；（二）無限性；（三）永久性；（四）不可分性。」

蒲芬道夫 Pufendorf 說，「主權的絕對性和最高性須分別開。絕對是管轄一切，不受限制；最高不過是在其管轄範圍內為最高不受限制而已。主權固然是最高且

是絕對不受限制。」盧梭也說過「主權有四特性；不過與有丹的分法不同，是：（一）不可讓性；（二）不可分性；（三）不能為非性；（四）絕對無限性。」

總之自布丹以後之主權論大多數是主張最高無限或不可分。雖然後日有聯邦制度之產生，有的學者說主權可分界於各洲及聯邦政府之間，可是美國的哲士都主張「基於主權而發生的特權則可分，主權的本身是絕對不可分。」

4、政府——是一國的重要的標記，因為要有政府，所有人民的公共意志方能發現與實行，人民的公共意志能得表現與實行，纔能成爲一個有組織的團體，否則如同羣人民雖然佔據一定的土地，但是他沒有一個最高權力行使的政府仍是不能稱為國家的。

Samner 說「一個政府的組織無論如何的簡單至少要有幾部，如同治者與被治者——即是有施命者，必有服從者，如沒有下令的人，同時也無服從的人，那就不能算爲國家。」從這一段話我們也可以知道甚麼是政府。

#### 五、學者們對國家的觀點。

對於國家的起源，國家的界說，國家的性質，我們已經援引了許多學者的論調。現在我們還要分門別類地看看各種不同的學者，根據他所專攻的學問對於國家的

觀點是怎樣。

(一) 歷史學的國家觀——是從歷史上去研究國家是什麼。不過歷史上並未把國家進化的程序如何詳細的指示給我們。我們只知依人類學家的說法，國家是家族發展的結果。因為最早的社會是沒有組織的，人與獸是無甚區別，由同姓兄妹結婚，變為異姓結婚；由一夫多妻制進而為一夫一婦制；由酋長制而變為宗法去編製家族，家長有統治的權力；於是成為血族團體。麥因 Maine 所著的 *The patriarchal theory of society* 內說：「血統說的原始是說不同的家庭，由於他們的家長用權力去把他們放到一起而保護之。」這個血族的家庭由於互相爭鬥的結果，為某種共同利害，遂結合成為國家。依生物學「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說法，則一方面是環境，一方面是天演，把人類迫到團結的一途，由小的血族團體進而為部落，由小部落進為大部落，再由大部落漸漸變化成為政治的組織，而成了國家。

(二) 宗教學的國家觀——這個說法是很不合乎科學的，差不多是沒有研究的價值，不過因為他在政治學史上佔有極重要的一個位置，國家的起源及進展中的不同的制度受他的影響頗大，所以我們不能不將他說一說。宗教學家的見解是根據神力去說明國家的性質和由來，

有的說國家是直接由神造成的，有的主張國家是依照神的命令所建設的東西。所以有天子和受命於天一類的話頭，而天子是幾乎和天一樣的神聖不可侵犯，因此人民服從君的權力即是服從國家的權力，也就是服從神的命令。古代的東方諸帝國，政教不分，如同土耳其直把宗教的經典看作國家的法律，希伯來人直說國家是上帝造的。希臘人與羅馬人說國家是由於上帝間接造成的。到中世紀基督教勢力漫於羅馬，人們深信上帝，認上帝為萬能，竟有將教皇比作日球，把國王比作月球。月球的光是由日球光之反射出來的，意思是證明國王的權是由教皇得的。換言之，國王要受教皇的支配，後來更經國家神權說者路德出而領導，神權的理論幾乎為一世之迷，一直到法國革命以後方受痛創，而破毀了這人間迷。

(三) 哲學上的國家觀——可分為二種：

1、自然派的主張——此派主張說國家的發生是由於自然界中人民互訂契約，所以有叫做「契約說」的；這派的學者的論調也互有不同：

a、霍布斯 H. Hobbes 說國家的成立由於戰爭，因為那時的社會人民生活太不安適，你爭我奪，毫無法治的限制，所以大家有共同利害的感覺而要離開這痛苦的社會，去建設一個安然法治的社會，所以每個人把他的自然

權利放棄一部分出來，而互訂一種契約，然後將這權力交給君主使他管轄人民，因此造成了君主的專制。因為這契約是人民間個人與個人訂的，並不是君主與個人訂的，所以君主不受契約的束縛，可以為所欲為，結果自是趨於專制，君主的權變為無限。無論他如何專制壓迫人民，人民唯有服從。

b、洛克Locke以為人類原始的社會是很自然平等自由的，因為那時沒有一個公共的權力，一切皆靠個人的自己裁判，一切皆以個人之利害為念，所以結果不免自私自利，為要調解個人的權利衝突，由於個人的自願將其權利的一部分交給政府，而使政府對個人自由權利加以限制及保障，所以人民除去交出的一部分的權利外，其餘的仍歸個人所有，統治者的權利並不是絕對的立於個人權利之外，乃是仍受個人權利的限制。依洛克的意見是說統治者的權利是人民給的，如果他用之不當或有違契約，那人民可反抗或將他的權力收回來。總之，洛克他是反對一國內主權無限制的，無論那種權都是有限的，他是為君主立憲政體辯護。

c、盧梭Rousseau他把人民的主權發揮到了極點，把國家的主權看成人民的權力一樣，政府不過是執行人民公共意志的僕役。所以一切的行事要以人民的意志為

依歸，人民想怎樣作就怎樣作。洛克限制政府的權而盧梭根本就否認政府的權利。人民之組成政府而將其權利之一部交出，並不是完全讓棄，乃是犧牲了個人自由的意志的一部去找到公共的幸福，所以主權仍是在民，不過將公共意志委之政府去執行罷了。政府的權利，人民隨時都可以收回，因為他是我們僱的僕役，如果作的好，我們當會獎他，或是叫他繼續作去；如果是不好，儘可迫他辭去，而另委賢能。他是為民主政體辯護。

2 實利主義者的主張——從來只有英國哲學家侯模Hume。獨出異論，不與他們那些神權契約相染，他以實利為國家的成立之主因，換言之，就是國家是為實利而產生的。他說人類的社會行為可分為兩種，(一)出於人類本能的行為，(二)雖非人類本能行為，確係事實上必要的行為。前者是倫理的，如父子間的天性；後者是義務的，如人民服從國家。人類社會上如果政府之存在社會不能獲得安寧與幸福，政府沒有人民服從，也不能支持，所以人民的利益，就是人民各盡義務服從政府的原因，而政府之基礎遂建立於實利之上。

#### (四) 法律學上的國家觀

1、國家客觀說——是把國家認為權利之目的物。主張統治者是國家權力的主體，國家為其統治之目的。

在歐洲中世記曾有這種思想，但是近世主張此說的，則不與昔相同。他們認為君主是統治的主體，國家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間的互關狀態，治者行使政權，被治者有服從的義務，於是國家就存在這個關係之上。

2 國家人格說——主張國家具有獨立的人格，牠是一個法人。我們可引一個法律學者對國家下的定義來作解析：「國家是以一定地域為基礎的法人；且有原始的統治權。」

(五) 社會學的國家觀——這個國家觀實言之與歷史的國家觀相符，也是以征服說明國家的來源，奧奔海麥 Oppenheim 可作這派的代表，他以為「國家是優勝的人羣要統治劣敗的人羣，並且要防止內部的反動與外部的侵略而設立的機關。」

(六) 無政府主義的國家觀，——這派認為國家是壓迫個人自由和保障資本階級的團體，故想根本廢除之。巴枯寧說：「人類自由上的兩大障礙：(一)是上帝(二)是國家。」他說，國家不是社會，乃是社會中在歷史上一種殘忍的抽象形體 *Abstractive form*；由歷史上看來，國家之產生是由於武力，國家之基礎是強權，所以國家只有命令，而無悅服。有名的無政府學家克魯包特金 *Kropotkin* 他著一書 *Mutual help* 說，在無政府之

下，各個人自動不要國家，因為國家養常備軍總是為的預備戰爭，所以為謀各個人之安全起見，更不必要國家。國家是美惡製產所。國家內之所以有盜竊及其他擾亂社會秩序之事項，就是因為這個壓迫個人自由和保障資本階級的團體剝奪個人的經濟自由而發生的。如在無政府下，各國人皆得經濟平等，即無此事發生。故無政府之目的，在根本廢除國家，代之以自由組織的互助社會。其所用的方法則不一定用武力。至於國家廢除後，這個自由社會是如何的社會及如何維持秩序呢？據無政府的人說是自動的團體，大家以大家所好而自動為之 (*use who can enjoying the interests join this group*)。這個社會仍由各團體組織而成，所以無政府主義並不是不要一切組織，乃是取消強有力之國家。

(七) 工團主義之國家觀——工團主義為社會主義之一派，他們認定國家是資本主義的制度，為保護一般資產階級之利益而來虐待勞動階級而設的。所以必想法將他廢除，然後由勞動階級握國家之實權 (*workers control the state*)。這個主義是法國的產物，在法國有一個 *Syndicat*，是由特別工人組織的。他們的總機關叫作 *Confederation (Zenerale du Travail)*；同時仍有一個 *Federation (des lowses du Travail)*；他們實現廢除國家的方法

，用革命方法；但在實力未足以前，他就採直接有害於資本家的行動（一）怠工 Sabotage，是在工作時間故意每日少作一點，資本家如加干涉，則故意與之為難，將其機械損壞，而減少其生產。（二）罷工 Strike 是向資本家（顧主）約求條件增薪。他們還說現在的罷工是一種試驗，將來還有總罷工，能否實現，尚不敢冒險，如有實現之一日，資本家即被打倒。

（八）共性主義的國家觀——這也是社會主義之一派。他們認國家是資本階級壓迫無產階級的一種工具，資本階級管理一切生產方法，所有財產皆在資本階級之手裏。國家內的日常表現，是資產階級利用工人階級。資本階級所有之政治理想，皆為騙人之政態。什麼自由，平等……那是資本家壓迫勞動階級的假面具，資本主義下的國家，是建設在武力之上，所以要打倒他也非用武力不為功。用暴動手段去打倒資本主義，而坐享國權，而變為無業階級專政的政府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我們現在引共產者的說法來證明：列寧說：「在這個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期中，壓制還是必要的，但是這個時期，所謂壓制乃是被榨取的多數者，壓制榨取的少數者；故對於壓制的特殊機關——國家——認為必要。但這個特殊機關，祇可稱為過渡期間的國家，並不

是含着通常意義的國家。」自此看來，俄國現在並非真正的共產國家。

## 六 國家的目的

最後我們要討論的是國家目的，德國學者赫路震多爾夫 Holzendorf 說：「國家之目的（一）發展人民的權利；（二）保障人民的自由；（三）促進社會與人民文化之進展。」布拉蒂之利 Buntz 說：「國家之目的在保障或增進全國家所有人民之安全，自由與幸福。」布爾基斯 Bueck 說：「國家之目的可分為三：最初是建設一個好的政府去保障自由；其次是如何使其國民達於至善發展他們的天才與生活；最後目的在使人類如何達到建設一個道義的文明世界」。

我們現在可以將上面的這些主張歸納起來，作一總結，就是國家之目的（一）保障全國人民之和平秩序安全與正義；（二）注重社會團體之利益與幸福，對於社會特殊有利事業為個人智力財力所不能為者，政府加以援助；（三）促進人類文明而達於至善之域。

## 黑表

資本家對其所嫌惡之勞動者，將其姓名，行動，品性通知其他資本家，請其拒斥該勞動者而製之名表也。亦即資本家團體抵制勞動者之手段，使勞動者無處就業。

# 蘇俄新作家札米亞丁

墨札譯

——曼哲斯特衛報巴黎通信

札米亞丁 (Eugene Zamiatin) 是今日俄國文壇上的大名之一。我聽說他已經到法國來，並且要在這裏勾留六個月，因此就打電話跟他約會。「曼哲斯特衛報麼？」他在電話裏說，「說實在的，你們也許是俄國公共圖書館跟閱覽所裏唯一看得到的報紙。」次日，我到他底旅館裏去訪問他。札米亞丁已經四十八歲了，但是從他底外表看來，却還不到三十五歲。他的確是個「新」的俄國人；舉動活潑，態度適合；一點也沒有斯拉夫民族那般無生氣的風味。他底兩隻灰色的眼睛，時時帶着譏諷的神情睜着。

「你是來看札米亞丁的，」他說，「但是你要知道，我跟柴霍甫一樣，是個重婚者。柴霍甫有兩個妻子——醫學和文學；我底兩個妻子是造船學跟文學。」歐戰的時候，他在英國居住過，並且曾經當過 Whitworth 船塢的打冰船 (Icebreaker) 總測量師。札米亞丁是俄國著名的打冰船專家，最近到加拉海 (Kara Sea) 跟若瑟夫陸

地 (Franz Josef Land) 去探險的六隻打冰船——包括列寧號——都是由他一手包辦。他又在 Zvezdno 充過建造新號 (Krasin) 的工程顧問。幾年以前，他捨棄了造船事業，但是依然繼續地在列寧格勒造船學校講演關於海事工程的問題。

札米亞丁在海事工程方面固然有許多成功，但是在文學方面的成功却更要引人注意。他底作品，論量雖然很少，論質却是優美。以文體而論，他是俄國公認的文學家之一，許多名人都是他底門下弟子。雖然如此，札米亞丁却是——引用他自己底話——「一個頗受持異端邪說者。」他有諷刺的思想，而諷刺這東西，據他說，在蘇俄却不是一種美德。有一次他竟因譏諷過甚下了幾天監獄。他底最主要作品我們 (We) 的譯文雖然流行於美法兩國，却依然沒有經俄國文稿檢閱官底批准。這本書對於美國機械化的文化加以特別的譏諷，和霍史萊 (Aldous Huxley) 底勇敢的新世界 (Brave New World)

蘇俄新作家札米亞丁

可謂異曲同工。但他在俄國却不受人歡迎。他底其他作品在俄國銷路甚廣，最近有兩篇戲劇，不但風行於莫斯科跟列寧格勒，而且傳佈到其他小城市。他說，「俄國底劇場至今尚可支持得住。這在世界各國中，實在是獨有的。我們沒有劇場的不景氣，我們在俄國是爲着人民 (People) 演劇，不是爲着一般公衆 (Public)，你知道這兩個的區別麼？」

「你在俄國起居能够舒適嗎？」

「所謂舒適，」他說，「本來是一個相對的名詞；不過著作家比起別種的人們，還總算小康。俄國食料感覺缺乏，住居情況也還依然不佳；莫斯科雖然已經建築了許多新住宅，但是四五個人擠居在一間屋子裏的事，仍然是很常見的。」

「你也是跟別人合居的麼？」

「不，」札米亞丁說，「我在列寧格勒獨自有一所三間屋的住房。成功的著作家，尤其是編劇家，他們底情形是例外。編劇家底進款只有普通官餉的百分之五六，他們是目下俄國唯一的合法的中等階級；任何人都不能干涉他們底財產。小說家底情形差不多也是如此；例如比爾尼亞克 (Prinik) 跟他底家人在莫斯科有一整所五間屋的房子。此外，政府還給著作者一種特別優待的

領權證 (Payok)，使他們有特權去享受牛油、乳酪，跟其他的奢侈品。從這點看來，蘇俄政府對於著作家的待遇總算很好。

「凡是專以寫作爲生涯的人，都可以得到這種領權證；在列寧格勒有七十五人，莫斯科大約有一百人。再則，我們底書局，不像你們底，對於著名的作家跟新進的作家並不很異樣看待。一個無名作者底作品，如果第一版出五千冊，他底酬金每一萬字可以有二百盧布（約二十鎊），再加一些版稅的墊款；一個著名的作者底酬金，可以比這多兩三倍，但是不能再多了。在俄國，一個作者如果真想要發財，他所作的書必須要售價低廉，發行普遍（至少要有三萬本）。但這是指那些對政治有用的書籍而言。」

「現下的俄國人，甚至鄉村人，都是重要的讀者。」札米亞丁繼續地說，「俄國已經是心理革命化了。記得有一個老村婦對我說過私人耕種制度和集體制度；她說這些名詞跟她說牛豬一類的東西是一樣底自然，一樣容易。在同一個鄉村裏，我却又聽到一個老婦口中念念有詞地誦着符咒。五年計劃的效果之一，是治療了俄國人底遲鈍與懶惰，這效果比經濟成功還要重要。俄國底新時代人物都信仰機器，主張美國化。未來十年或十五



年的俄國，一定是令人驚奇的。」

「那麼，在五年計劃的進行之中，文學底作用究竟是什麼？所謂『爲五年計劃而文學』，是什麼意思？」

「我也許是個特異說者，」札米亞丁微笑着說，「依我看來，這句話是毫無意義的。那是一個幼稚的理想主義。站在工程師底立場來說話，我知道沒有一篇工業小說能夠生出額外的鋼來。站在著者底立場來說話，我知道如果蓄着慾望去寫些關於工業的東西，結果只是寫出許多壞的小說。」

「但是不多月以前，情形完全改變了。爲使你明白這個改變起見，我最好把革命以來俄國文學的大概情形略爲提到。在『飢荒的』那幾年裏——內戰及軍事行動的時期內——世界似乎已經到了末日，未來派握住了至尊之權。他們聲言要獨占新的普羅文學。新經濟政策的時期，顯示着俄國文學才能的新爆發；但是這個新文學却並不是普羅的。那時期裏最好的作家是那些 Popuchiki（即『網路伴侶』之意）。他們表面上雖然多數人對於蘇維埃革命表示同情，但他們多半是屬於智識階級，而不是共產黨員。」

「在這些人之中，有幾個作家是真正有天才的：V. 8 Tolstoy, Ivanov, Babel 等關於內戰的小說，新穎，有力

量，而帶着詠史詩的體式，是俄國文學中許久未見的；Zoschenko 是新俄底柴霍甫；Ognev 底新俄學生日記聞名於英國；Piniak 雖然不能算是完善的作家，但他底新體格却驚動了一般人；Bulakov 是多才的編劇家，Leonov 是第一等作家；此外還有其他著作家。俄國文學繼續地繁盛着，大約到一九二六年爲止。

「同時又產生出一種著作家，幾乎完全是共產黨員；此中包含有 Gladkov，他底水門汀（Cement）是工業小說的第一篇；此外還有許多更有天才的作家，如 Sholokhov，他底靜靜的頓河（Quiet Don）是一篇帶有詠史詩的小說；Fadiev，他底潰滅（Destruction）是描寫西伯利亞內戰的一篇很好的小說。」

「不像 Popuchiki，這些青年普羅作家底作風都是簡潔的，直爽的，天真的。他們把托爾斯泰當作模範。在五年計劃開始的時候，這些普羅作家是很得勢的。他們組織了一個俄國普羅作家聯合會（The Russian Association of Proletarian Writers，簡稱 The Rapp）他們自謂是唯一的蘇俄純正作家；說他們代表蘇俄的真精神，他們是提倡爲五年計劃而文學者。」

「曾有一時，Rapp 大受俄國當局底鼓勵；不久之後，他們便獨占了文藝的批評。Rapp 底評論，多半是鼓

吹自己，攻擊他人。他們常常無故地指摘 Popuchiki 底作品爲反革命。這種政策的影響很不好。Popuchiki 中有許多極有天才的俄國作家，他們都盡力地去牽就 Pap 的評論中所需要的條件。這種努力的結果多半是使他們失敗；例如 Piniak 底華爾加 (Volga)，Leonov 底醉漢 (S. O.) 都是關於工業問題的小說，英文都有譯本，較之作者以前作品却差得多了。

「但是不幾月以前，有一件意外的事情發生——實在是個文藝苦迭癢。蘇俄底最高當局認爲 Rapp 這種行爲不能再讓他繼續下去；也許是受了高爾基底勸說，他們突然不顧一切地解散了 Rapp，把牠底獨占權停止了。但是我以爲 Rapp 底影響並不能完全湮沒的。許多以前對於工業問題不關心的作者，都開始對牠們感與興趣。許多舊作家都被新精神所浸染；他們對於一切事物都研究實際，觀察程序。Rapp 底會員現下已經跟 Popuchiki 所組織的作家聯合會 (The Writers Union) 連絡起來。我相信這個聯合的結果對於雙方都很好。二者之間從此可以互相感化，互相輔助；我並且相信將來的文學是「普羅作家底現實主義跟武斷主義」同「Popuchiki 底高超藝術跟理想天才」的一個綜合。在幾年之內，俄國也許要踏入一個偉大文藝成功的新時代。很僥倖，蘇俄當局已

經覺悟到文學這種東西不應使牠變爲宣傳品。」

### 新木乃伊

三千年前埃及的木乃伊；是歷史上的一個大奇蹟，同時也是一個大秘密，因爲至今沒人尋出他們究竟是怎樣製成的。

不過三千年後，我們的後人也可以得到我們的木乃伊，而且是比較三千年前的埃及人留給我們的還要好的木乃伊。

埃及人的木乃伊，雖能久歷幾千年的長時間而不腐，然而我們仍無從得一瞻古代埃及人的風彩，因爲他們的木乃伊都改變了顏色，縮小了肢體，直成了一具枯屍。

E. J. Parrott 說，我們的新木乃伊，用 Parrotin 製成的木乃伊，既不會變色，又不會縮小，且不會發枯，更可以經久不壞。

因此幾千年後我們的後人將不難得瞻仰我們的容貌了。

# 未婚妻

徐卓羣譯

此篇作者爲 Marguerite Audoux 女士，曾著有 Marie Claire 一書。女士將日常生活見聞，加以藝術渲染，出之無不絕妙；其想像之精微，刻畫之逼真，寓意之深遠，具見于斯篇矣。

譯者。

幾天的假期完了，便又動身回巴黎去。到了火車站，車裏的乘客已是十分擁擠。我一輛一輛地瞞過去，希望能找到一個空座。在最後的一輛裏面，看見一個座兒，可是給兩個大筐子佔住了，筐裏的鴨子和母雞時時向外探頭。我遲疑了半晌，才決定進去，向乘客們道了歉，有一個工人裝束的向我說：

「小姐，您等一等，我把筐子搬下來。」

我替他提起放在膝上的一籃水菓，他把那兩籠雞鴨推到座位底下去，鴨子們有點氣憤，咕咕地叫了起來，母雞們都垂着頭，好像受了侮辱似的。那位鄉下人的妻子呼喚着他們的名字，和他們說話。

我坐定下來，鴨子也不鬧了，這時坐在我對面的一位旅客，便問那鄉下人是不是拿這些雞鴨上市去賣的。

鄉下人說：「不是的，您哪，我的孩子後天就要娶親了，這是帶去給他的。」

他的臉上喜氣洋溢，說時向四週的人看了一眼，似乎盼望每個人都要知道他的快樂才好。角落裏的一位老太太，靠着三個枕頭，弓着腰，她一個人佔了兩個人的座，口裏還不住地嘖嘖咕咕，說這些鄉下人佔了這許多地界。

車開了。方才打聽雞鴨的那位人，剛打開報紙，那鄉下人便向他說道：

「我的孩子在巴黎，他在一個鋪子裏作工，他要娶的那一位姑娘，也是在那鋪子裏作工的。」

那搭客把報紙放到膝旁，用一隻手拉着，略探着身子問道：

「新娘子漂亮嗎？」

那人說：「我們不知道，我們還沒有見過她哩。」

那客人說：「真的嗎？如果她要是漂亮，你會不喜歡她吧？」

那人說：「那是常有的事。但是我想我們會喜歡她的，因為我們的孩子不會娶一個醜怪的女人來使我們失望。」

坐在我旁邊的一位矮小的婦人便插嘴道：「再說，如果她能叫菲力愛她，她也能叫我們愛她的。」

她轉過頭來看我，一雙慈祥的眼睛，充滿了笑意。那副小巧的容貌，又圓又嫩；我真有些不相信她會有一個年齡已够娶親的兒子。她問我是不是去巴黎，我說是的；不提防坐在我對面的客人，便打起趣來了。

他說：「我情願打賭，這年輕的姑娘，就是你兒子的未婚妻，她瞞着你們，偷偷地來看她將來的公婆呢。」

大家的視線全集中到我一人身上，羞得我滿臉通紅。那鄉下人和他的老婆一齊說道：

「如果是真的，那我們就高興極了。」

我告訴他們並沒有這回事。但那乘客又拿話提醒他們，說我怎樣怎樣地在外面踱來踱去，走了兩趟，好像

找什麼人似的，又說我怎樣怎樣地猶疑了半天，才決定走上車來。

搭客們都笑了。我竭力解釋說我是為找一個空位子

。那鄉下婦人就說：「不關事的，如果我的媳婦長得像你一様，我就快活得很了。」

她的丈夫說：「是的，我希望她長得像你這模樣才好。」

那搭客繼續向大家開玩笑，他很很地看了我一眼，又對他們說：

「等你們到了巴黎，就知道我的話不錯了。你們的孩子會告訴你們說，這就是我的未婚妻！」

停了一會兒那鄉下婦人面向着我，在籃裏摸索了幾下，掏出一塊餅來，說這是她今天早上親自做的。我當時不知道怎樣回絕她好，只得說我着了涼，身子有點發燒，不大舒服。那餅子是又回到籃裏去了。接着她又送過一把葡萄來，沒法子只好收下。火車停了的時候，她的丈夫一定要去拿一點熱的飲料來給我喝，好容易才把他勸住。

當我看了這些慈祥的人們，這樣急急地去愛他們的兒媳，我真深以自己不是他們的媳婦為憾。我知道他們

一定會拿真情來對待我的。可憐我身世飄零，自己的父母，從來就沒有見過面，一向就混在陌生的人羣裏。

我窺見他們不時的定睛向我瞧。

到巴黎車站的時候，我幫他們把箱子搬下車來，並把出站的路線告訴他們，我在他們後面不遠地跟着走，只見一個身材高高的少年跑了過來，一把抱住他們，吻了這個，又吻那個，吻了又吻。他們笑逐顏開，顯着非常快樂的樣子。搬夫揹着行李從後面撞過來喊叫的聲音，他們也沒理會。

我跟着他們到了站門口。他們的兒子一隻手挽着那籠母雞，另一隻手伸過去，圍着他母親的腰。他像他的父親一樣有兩隻快活的眼睛，和充滿笑容的臉。

這時站外天快黑了，我捲起大衣的領子，依然在一對快樂的老夫妻後面不遠的幾步外慢慢地走。那時他們的兒子僱車去了，鄉下人一面輕輕地拍着一個斑點大母雞的頭，一面和他的老婆說：

「早知道她不是我們的媳婦，就把這斑雞送給她。」

他的妻也輕輕地拍着那母雞的頭說道：「可不是嗎？早知道就好了。」

她向出站的旅客們走去，翹起眼睛望了一望，說

道：

「她跟這些人一塊兒走了。」

他們的兒子僱了一部車子回來，把父親母親安頓好，自己跳上車箱，和車夫坐在一起，側着身子，好回過頭來看見他們。他像是很壯健文雅，我心裏想：「他的未婚妻真是一個幸福的女子。」

等到車子看不見了，我才懶洋洋地踱上大街。我雅不願回到我那寂寥的小屋子裏去。今年二十歲了，從來就沒有人向我談過愛情。

### 糖果的包皮

普通糖果的包皮，多半是用透明的紙。

可是對於含有油質的糖果，或其他食物，則以用草綠色

的紙包爲佳。

因爲綠色可以隔絕能發生光電作用的光線，而使食物得

保持原來的滋味，不致酸腐。

除綠色外，黑色也有同樣的効力。因此黑色紙也可以用

來作糖果的包皮。

## 滑 冰 術

譯 札 墨

## I 滑冰的姿勢

花樣滑冰(Artistic Skating)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發揮滑冰者內潛的個性；所以凡是關於良好姿勢的法則，無不以發展個性為前提。

普通人往往只顧到花樣的矯正，而忽略了正當的姿勢，這實在是個大錯誤。初習者應當首先研究良好的姿勢；花樣的對否尚在其次。直等到完善的姿勢能够應付自如，然後才可致力於花樣的準確。

最普通的手病是：垂頭，舞手，上軀及「休止足」(The Unemployed Leg)的過分彎曲。

遠在一八六三年，滑冰專家已經注意到頭部舉止的重要；他們說：「如果身體的位置拙劣醜陋，縱使花樣優美，亦不足取。頭部的姿勢尤其重要，因為其他各部的姿勢都是以牠為轉移。」

頭部下垂是一種鬆懈的表現，下垂的原因多半是由於滑冰者俯視冰上的花樣。滑冰者應當時常練習着使滑冰時不必俯視。有時因為要知道轉轉的地點，稍為下視固然是可以的，但是下視之後，頭部便要立時抬起。

兩臂不要過分的上下揮舞，牠們只能在轉彎的時候做些分內的工作使身體得以平衡，但是却不要像走繩者那般的使用牠們。雙臂的過度使用必須要避免，更不要使牠成爲一種習慣。

上軀左右彎曲的原因，是因為滑冰者用冰刀的一邊(Edge)行走時恐怕下跌所致；但是經過練習之後，這種毛病便不至再常常發生。身體向前彎曲對於某種動作是必需的，如向前躍進——但是動作完畢之後，須立時恢復其正當位置。

「休止足」(The Unemployed Leg)只可略為彎曲；過度的彎曲顯出極笨拙的姿勢，且使其失去作用。其實所謂「休止足」不如稱爲「平衡足」(The Balance Leg)較爲妥當；因為牠的冰刀雖然離冰，牠支持行動的效用，跟踏冰之足一樣重要，滑冰者應知利用牠。滑冰之能順利自然，多由於手足之使用適合。「休止足」之正當姿勢是牠的足尖向下向外。要想把足尖向外，必須把「休止足」從腰部起向外。這在初習的時候不很容易；但滑冰者應勤苦練習，使這困難不至發生。

每種花樣都必須從「休止足」滑起，所以當右足起滑時，則左足的冰刀必須用力一踏，使右足得到動力的全部，但右足不得預先有些微前衝之力。又滑冰者須注意：踏冰時，須用冰刀之邊，而不用冰刀之尖端。

下面是滑冰專家們從經驗得到而擬下的幾個正確姿勢的標準法則：

1. 頭部須端正。無論「自由滑」，或「花樣滑」，除在絕對必要的時候外，兩眼不可俯視。
2. 身體須直。不可從腰部向前或向兩旁彎曲，兩肩向後，胸部前挺。
3. 兩臂無論其爲自動或被動，須以肩爲中心，自由擺動；肘部略彎，掌心應向下向內。
4. 踏冰之足須在膝部彎曲，使身體之升降得隨意自如。
5. 「休止足」完全從腰部懸空，且盡力使其向旁向後；與踏冰之足須完全離開，膝部稍曲，足尖向下向外。

(本節已完，全篇未完)

give him as much happiness and love as I can—a great deal. I love him very much and he me—I know it—what I bring to him, he will give back to me—we will enrich each other by all in our power; and, if necessary, we will part as friends.” Think of the so-called college students, the highest educated Chinese youth !

We are now talking about proletarian literature. Nevertheless, how many of us are really proletarian? Who has a bit of actual experience? Again, it is a parlance ! No, not only that; it is the way of being modernized straightway. Nothing is so easy.

Russia is now a world where everything has been turned upside down; everything stands out new and odd to those bound by the thread of tradition. The five-year plan has been successfully carried out. Russia could be turned upside down and rejuvenated in every line because of her having those heroes and heroines. To rule a world is one thing; to build up a new world is quite another. Russia is demanding and will continue to demand more of the world's attention, economically, socially and intellectually.

What we have long been in need of is revolution—revolution in everything ! But wherefrom shall our heroes and heroines step out? When shall the revolutionary tempest be aroused and mount up in every soul? Thirty, forty, or, fifty years hence?

“Mother” is a mirror for us to look into; it teaches us a great, valuable lesson. The lesson is one of truth, reason adjusted by a mother's love, a heart big enough to suck all the sufferance of mankind. What a historian, or a philosopher, might have attempted in vain through many tomes, Gorki effects infallibly in a few chapters. When he has done, Russia stands forth in a flood of light.

“She is probably the first mother who has followed the footsteps of her son.” Gorki's vigorous hands have made two generations cooperatively strive for one great cause.

**Mother was beautiful !**

Of all Russian life dramas the greatest was the drawnout struggle against the old regime. It was a bitter struggle not seen before in human history. When we learn that within seventy years more than 800,000 political exiles passed through the same gateway to Siberia, we can surmise the extent of the tireless tyrannical repression which Gorki has exposed to us.

It is highly edifying to the Chinese people to read such a book at this critical time. See, what personalities their revolutionists have cultivated! They are faithful, cool-headed, self-immolating, strong and firm. Above all, how able and intelligent they are! They know what they are about to do and how to do it. I am particularly impressed by those female comrades. They are ideal ones. Picture this in your mind: "Before her (the mother's) eyes she gazed a smooth plain of snow spread out in the distance. The wind, carrying white, shaggy mases, raced over the plain, piping cold, shrill whistles. Across the snowy expanse moved a girl's figure, dark and solitary, rocking to and fro. The wind fluttered her dress, clogged her footsteps, and drove pricking snowflakes into her face. Walking was difficult; the little feet sank into the snow. Cold and fearful, the girl bent forward, like a blade of grass, the sport of the wanton wind. To the right of her on the marsh stood the dark wail of the forest, the bare birches and aspens quivered and rustled with a mournful cry. Yonder in the distance, before her, the lights of the city gleamed dimly. Have you not the picture in your mind now? How and what do you feel? So this is the life of a revolutionist! To be such means hard trial, great agony, perilous hazard, and laborious toil; yet to us Chinese, a parlance, a slogan, a phrase, and nothing more. See, how a revolutionist loves: "He is free at any moment. I am his comrade-a wife, of course. But the conditions of his work are such that for years and years I can not regard our bond as a usual one, like that of others. It will be hard, I know it, to part with him; but of course, I'll manage to. He knows that I'm not capable of regarding a man as my possession. I'm not going to constrain him, no." "I know what I'm doing, I know what I may expect. I'll be happy if I can make him happy. My aim, my desire, is to increase his energy, to



her and pleasant. It set her head erect on her shoulders." She was happy and proud of her usefulness in this new life.

Mother and son together struggled, struggled for justice, for reason, and for truth. Pavel had been two times in prison and was at last exiled to Siberia. The day immediately following Pavel's final trial, mother was also arrested at a station. How wonderful and admirable these souls were!

There exists such a race like the Russians; so there is such a work like "Mother." No country and no other human beings in this visible world may be put on the same level with Russia and the Russians, an unusual country and an unusual race with unusual conditions of life. "The extreme cold and the unreasonable heat, the long gray winter of scowling skies, wild winds and scanty day-light, the weird "white nights" of June, the savage aspects of the snow-covered plains and their magic transformations when the summer suns scarcely set, must have wrought something upon racial nerves historically tense. Add to this the chill shadow of despotism in which, from cradle to grave, man drew never a full breath of ease, the blight of an anomalous system of cruelty and horrors, and all causation seems at hand for inordinate effects. In Russia, accordingly, everything is man carried to the nth power. There men are fiercer and gentler, more cruel and more kind, more selfish and more self-immolating, more hateful and more loving, more ignorant and more learned, more stupid and more alert, more welded to autocratic tyranny and more devoted to freedom, more inert and more passionate, more naïve and more sophisticated, more obscene and more delicate, more emotional and more repressed than anywhere on earth." Such are Russia and the Russians. That is why to most of the westerners the U. S. S. R. appears to be a profound, incomprehensible mystery, yet how formidable and monstrous!

Of all these human dynamics, of all their manifestations that conquer and absorb whosoever may observe them, the greatest delineator is M. Gorki and the greatest of his works is "Mother." He has led us to feel Russian life as it is. He is an exponent of a remarkable people, a faultless painter.

Vlasova had a son named Pavel. When Pavel was a boy of fourteen, his drunken father died. His death was in fact a relief to his wife. At first, Pavel, as a factory worker, tried to live like the rest, following the beaten path trodden by all. Yet gradually an obvious change took place. Pavel became neat, sober, and serious-minded day by day. He never drank now and began to bring books home. The mother was proud of her son; but a feeling of apprehension and anxiety stirred up in her mind when she saw that Pavel was leading away from the yoke of the life to which all, including herself, had long been accustomed.

Then, one night, the mother could no longer keep silent; she tried to ask her son and they talked almost the whole night. What Pavel said was indeed no less than a sermon, true, lofty, tender, and human, by which the mother was guided to face something shockingly strange—yet illuminating, bright and lively..... a new world and a new life. Pavel had been reading forbidden books. They are forbidden to be read because they tell the truth about the workingmen's life. Pavel would be put in prison if it were found out that he wanted to know the truth. Having said everything, Pavel begged his mother not to worry about him. To this the mother yielded a tender assent while deep in her heart, a feeling of fear and pity intermingled with a bitter sorrow, whirled up, gathered and melted into big tears rolling down her cheeks. It was the first time she had heard such language about herself, her own life. She did not understand Pavel when he was speaking about matters not concerning herself, but all he said about her own woman's existence was bitterly familiar and true. She prayed for her son.

The mother was now standing before the threshold of a new life; to understand her son, to help him and work together with him. "She had never before felt herself necessary to anybody. When she lived with her husband, she knew that if she died he would marry another woman. It was all the same to him whether a dark-haired or a red-haired woman lived with him and prepared his meals. When Pavel grew up and began to run in the street she saw that she was not needed by him. But now she felt that she was helping a good work. It was new to

Poor Lu, blessed are you to whom the present world with its bright and dark sides will have no significance. The miserable world which you left behind has not a bit changed. May your soul be at rest in Heaven ]

### A BEAUTIFUL MOTHER

A Chinese Valuation of Gorki's "*Mother*"

By Lula C. H. Wang (王純修)

About one month ago today, I began to swallow this book word by word and finished it in three days. Often, I reread a certain paragraph or a certain sentence again and again. I was immensely moved; yet I could not write anything about it and about the throbbing of my own heart. "Mother" had said all; it exhausted me. All the time, I have kept thinking and developing that vital strength which one needs in writing a review of such a work. Now, I am almost in a fever, it is time ]

The story began when Vlasova, the wife of Michael Vlasov, a factory worker, was already at the age of forty, and had been suffering a great deal. Her childhood was sunk in a gloomy shadow; her life after marriage was even worse, an unbearable pain. To be scolded by her gloomy, sullen, brutal, husband meant good luck to her, for the expected gifts were kicking and beating. "She was tall and somewhat stooping. Her heavy body broken down with long years of toil and the beatings of her husband moved about noiselessly and inclined to one side as if she were in constant fear of knocking up against something. Her broad, oval face, wrinkled and puffy, was lighted up with a pair of dark eyes, troubled and melancholy as those of most of the women in the village. On her right eyebrow was a deep scar which turned the eyebrow upward a little; her right ear, too, seemed to be higher than the left, which gave her face the appearance of alarmed listening. Gray locks glistened in her thick, dark hair, like the imprints of heavy blows. Altogether she was soft, melancholy and submissive." Now and then, she discussed life with her neighbors, spoke a lot; but all of them, including herself, only complained; no one explained or even thought of why life was so hard and burdensome, and had the will of getting rid of it,

That very afternoon, I heard them say that he, after having been examined by the doctor, had been sent home. I went directly to the Director of my dormitory.

"What is Mr. Lu ill of?"

"Scarlet-fever."

"Serious?"

"Yeh !"

"Is there any hope of recovery?"

"We shall hear later."

I left the office with a heavy heart.

Just then, the news of his illness was spread wide in the university, and a constant telephone communication was kept between the college and his home, so as to be able to hear about the progress of his malady from moment to moment.

Next day I was informed that he, after the treatment of a certain doctor, became mad, and that in his insanity, he burnt his bed-clothes to ashes.

Two days later, the worst news was reported, and confirmed.

I called upon Dun directly. There were already several of Lu's friends in the room. Their sad faces showed the deep sorrows in their hearts. They were conversing about Lu's death.

"His death is most unexpected," said one.

"I am sorry that we have lost a most honest friend," said another.

"I have never seen a milder man. Not one angry word has ever come out of his mouth," said a third person.

As for me, my heart was oppressed on all sides by the heavy weight of the sudden death of a most diligent, self-confident man, responsible for the high-sounding name: Lu's Form.

Dun, a light-hearted boy, came up to my side and said:

"Isn't that sight funny?"

"Indeed."

"Isn't it interesting that we should designate this as Lu's Form?"

"Sure. Let us cheer him up by that name."

Accordingly, we shouted simultaneously, "Hula ! Lu's Form !"

Lu stopped short and turned round. A reproachful smile was at first seen in his face, but that instantly gave place to a playful laughter, which, mingling with ours, died away in the silence of night.

Lu slid up to us and said, carelessly:

"You naughty boys, don't be proud of yourselves. I can beat you in a fortnight."

O ! How these words are ringing in my ears now as if they were spoken but yesterday ! How vivid his ridiculous Lu's Form to me now ! How we shouted ! How we little suspected in the midst of our merriment that three months later we had to lose him forever !

Thenceforth "Lu's Form" was on our lips whenever we saw him skate.

The next term, we still dined together. (It was one or two weeks before the spring vacation that he met his death.)

One day, Lu came to dine later than his wont. His face was burning red and his eyes looked duller than usual.

"Ah-Lu, you are feverish !" I exclaimed.

"Yes, I am ill," said he languidly. "While attending the second class this morning, I felt my head turning round. Finding that I could no longer support myself, I went to my room to have two hours' rest. But I feel worse now."

"You had better take some 'tan-mien', as rice doesn't fit your taste," I urged.

He agreed and ordered one bowl of 'tan-mien', of which he ate a little in a great hurry, and then departed. I followed him with my glance, not in the least suspecting that I could never see him again.

I bade him good-night and came out.

Next morning at about seven, as I strolled after breakfast on the playground before my dormitory, I saw him in a running suit walking across the ground toward me, still panting hard.

"Where have you been?" I asked him.

"I have just had a bit of cross-country-running,"

I was left amazed.

Later I was told that he took practically every "night-train." and that he was seen every morning at his exercise, by which, evidently, he attempted to improve his bad health. I greatly admired his boundless energy and am sure now that it was overwork and bad health which caused his early death.

Then winter came. With it came that biting cold which froze the rippling waters of the small lake before Shu Shan Hall into a stretch of smooth ice. Skating season had begun. As Lu and I were great friends, we often skated together; not every day, of course, but either on Saturday afternoons or Sunday mornings. It was our skating together that offered an incident which made his image always vivid in my memory.

One cold Saturday night, Lu, I, and another friend of ours, also a Cantonese, by the name of Dun, skated together. It was about nine. There were no people around except the three of us. We flew over the ice in great rapture, shouting, and dancing; our laughter could be heard far in the still atmosphere. Above us, a starry sky, with a brilliant full moon; around us, faint images of trees and buildings; under our feet, nothing but the ice, smooth ice, which reflected beautifully that bright lamp light from above.

Lu skated badly, as he was just a novice. He rather walked on the ice than skated; and when he did try to skate, he presented a most interesting spectacle: he flung his arms wide apart, moving them back and forth alternately just like a pair of oars in action; his body, bending forward, was in a convenient position to fall down at any moment; and his feet, fitted in their skating shoes, never dared move freely, as if constrained.

a slightly bending body of medium height, a face pale yet grave, and two eyes somewhat dull and sad. He was a man of few words. But he was mild and kind; when you talk with him, you would never fail to perceive the soft and genuine smile hovering on his lips.

His diligence was well-known throughout the university. In my dormitory, a particular study-room where light is not to be put out all night is set apart for those students who, seeing that the required work has not yet been completely done during the spare moments in the day, wish to make up at the expense of the sleeping hours. Any student reading in that room after the sleeping bell has rung is said to be taking the "night-train." Now one night, as I staggered downstairs on my way to the washing-room and passed by that room, I chanced to peep in through the door. I saw, in my sleepiness, a figure bent over a book. On close scrutiny, I recognized it was Lu. He was alone, for it was very late.

He sat opposite to the door and seemed composed and busy. His bent body and strained face, under the dazzling lamp light and amid the dead silence of night which might have terrified me, presented a most singular spectacle. Feeling moved, I pushed open the door.

He instantly raised his head as if startled. Seeing that it was I, he nodded; a soft smile floated on his lips. But this only lasted for a few seconds. His attention was drawn directly to the book again. I advanced toward him.

"Ah-Lu, you are too diligent. You ought to rest by now. Overwork does you no good and may even impair your health."

He was silent at first. Then he raised his eyes to me and said:

"Thank you for your concern of me. But, my friend, please don't be anxious about my health. I know myself best. I have just a little French unread, which I wish to finish before it is too late."

He then dropped down his glance and returned to his work with full attention. I was speechless. I saw beside him on the table a note-book which was written in so neat a hand that it looked printed.

failure would no longer mean anything. You are free, free from the bitter shackles of Ambition, Anxiety, Passions, and Age. To you all is unbroken silence. Your fate after death will be extinction and oblivion. Nevertheless you are not alone; myriads have gone before you and myriads will follow. So, good-by."

I feel still worse when I pass by the gloomy shop where coffins for sale are piled up one upon another, always waiting to hold those unfortunates whom Life forsakes and Death claims. Their grimy faces never fail to make me shiver. Just think that some day, sooner or later, I must fall a prey to one of their horrid bosoms, to be packed up and separated forever from the dear ones, the lovely songs, the bright sunshine, the blue sky, the gentle breeze, the fragrant flowers, the green grass..... How terrible !

O ! Death, intimate companion of Life, you are ever so ready to take away whatever Life has created ! O ! mortals, ever so brittle, do you realize in your bloom of age that Death keeps close watch over you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o the end of your journey?

Although Time has marked on my brow but twenty-four years, I have not mistaken the threat of death. Several of my friends, in the prime of their age, fell unexpectedly into its relentless hands. I wonder when Death may have its chance to snatch away the dear people with whom I now laugh and talk.

Among my dead friends, one named Lu Chiun Chang has impressed me so strongly that his image emerges easily out of my dim memory. I have never recalled his untimely death without heaving a deep sigh.

I made his acquaintance when I was a freshman of this University. He was, like myself, a Cantonese. We lived in the same dormitory, and we arranged to take meals together every day with four other Cantonese students. So we often met and conversed; our intimacy continued increasing day by day till his death in the last spring.

~~He was a Junior majoring in chemistry, aged about twenty-four, with~~



wagging one way and the other with quick turns in the air. By this moment all things on the earth seemed, all of a sudden, to recede from me and immediately their influences upon me waned. I was free, I was liberated. The slow but steady rise through space elevated me. Nothing was in my mind save one single idea that kept on warning me not to tell any one that I was dead, especially the cause of my death. There must have been many gods waiting for me, for who gave me a pair of wings by virtue of which I could fly now? I passed over the tops of mountains, I entered into the clouds, still I kept on hovering not knowing whither I was going.

At length something warm held me by my neck, so warm that it made me begin to feel my limbs were still with me. "What can this be?" I questioned myself at once curiously and cheerfully. "Oh! the sun, the sun!" a voice within me answered. I made an effort to open my eyes and I found I was well nestled in bed while the warm morning sunshine was just pouring through the window on me. I revived again. What an ideal estrangement from the entangling worldly affairs!

"O death! Thou strange, mysterious power, seen every day,  
yet never understood but by the incommunicative dead."

#### A YOUTH'S DEATH

In Memory of My Friend Lu Chiun-chang (陸儉昌)

By C. C. Hsü (徐卓羣)

I feel dejected whenever a coffin is within my sight. So to my great misfortune, occasions for dejection are in store for me. Oftentimes, as I pursue my way along the street in high spirit, my eyes would suddenly catch sight of that wooden thing, shaped like a box, sometimes elaborately decorated, carried along by a group of beggars, followed by the wailers behind. All at once my heart would sink down, while my breath would stop, and my glance turn the other way to shun its odious presence. I would address the dead silently within myself:

"Poor frail petty thing, at last you must go and seek your eternal rest in that other world of darkness. Happy are you to whom earthly blessings or sorrows, beauty or ugliness, wealth or peverty, success or

It seemed I was taking a leisurely walk in the French concession here at Tientsin, when I came across my late brother, Tien pang, in front of the National Hotel. He stood there motionless with a pistol in his hand and with eyes wide open. What he was intending to do I did not know, but I saw clearly that he was staring at me. Why, seventeen years had passed since he left this world at the age of ten, and he should be, accordingly, twenty-seven now. But he stood before me still a ten-year-old boy who seemed to live entirely independent of time and was not subject to the laws of change. Nevertheless I still admitted without a single doubt that he was by three years my senior. At the sight of him I was overwhelmed with joy and earnestly accosted him, intending to pour out my mind to him and acquainted him with what had happened inside and outside of my house since his never-to-return departure. To my great surprise mingled with profound disappointment, he held his tongue and gave me no answer, nay, not even a nod. Earnest as I was, I could not stand this kind of dreadful suspense, and in a fit of mad, brotherly affection I rushed to him with an intention of embracing him. O Heaven! what was that? He stretched forth his pistol and in a fit of unreasonable wrath he killed me with one shot.

I was dead, I felt. My head began to run round; my sight, my strength and speech forsook me, I tried to move but my limbs failed me. In an instant the ground on which I lay down seemed to turn round and walk away from me. Amid the humming sounds without and the whirling giddiness within, indistinctly I heard my angry brother say, "Serve him right!" "Well," I thought "I used to fall out with him when we both were children and can this mean his revenge upon me?" Although I did not know whether there was yet an "I" or I was a mere myth, I was still conscious of my own existence; I was still conscious of my extreme fatigue, my unbearable pain and that my gash was bleeding. Everything that was outside of me was out of my notion.

Now a thick fog began to envelop me. Oh, it was so oppressing that I was smothered. Left in such a helpless state suddenly I felt I was propped by an unknown force that made me rise higher and higher while I was

Meseemed I stepped up the platform,  
And cried out a dark, bloody oath:  
By Mars, revenge or we die  
In the unknown land !

I clad myself in armors white,  
I led the warriors forward,  
Shouting the songs of war,  
In the unknown land.

I heard the cannons thundering,  
I fought amid smoke and fire;  
I fought and foremost fell  
In the unknown land.

I have dreamed a strange dream,  
I dreamt of warriors lying in heaps,  
Dead corpses strewn in the fields,  
In an unknown land.

#### DEATH IN DREAM

By Kao Tien-sheng (高殿森)

In the plain but sharp retort towards his false accusers, Socrates once remarked that the fear of death is the pretence of wisdom, being a pretence of knowing the unknown. Indeed, death has no terrors for me. It is rather an event I look to with cheerfulness, if not with pleasure; because it can present to the mind scenes, characters and feelings far more charming than those which we are acquainted with in life. I am not lying and I have good reason to say this. I can well make good of my assertion to you, provided you are willing to listen to my seeming nonsense.

There is an old saying in our country which runs thus, "If one thinks intently of something in the day, one is bound to have a dream of it at night." If so, then I must have got something into my mind yesterday though I failed to notice. For a strange dream came to me as soon as sleep settled clouds around me and wrapped me in his cloak:

# THE ENGLISH SUPPLEMENT NANKAI WEEKLY

No. 5

Nov. 24, 1932

## CONTENTS

- |                                       |                 |
|---------------------------------------|-----------------|
| 1. In an Unknown Land (A Poem)        | Wu-chi Liu      |
| 2. Death in Dream                     | Kao Tien-sheng  |
| 3. A Youth's Death                    | C. C. Hsü       |
| 4. A Beautiful Mother (A Book-Review) | Lula C. H. Wang |

### IN AN UNKNOWN LAND

Wu-chi Liu. (柳無忌)

I have dreamed a strange dream,  
~~I dreamt of warriors clad in white,~~  
In the depth of weird night,  
In an unknown land.

I dreamt I heard their voices loud,  
Roaring out the songs of war,  
Grimly fierce and melodious  
In an unknown land.

I followed the call of my heart's yearning  
I joined the file of warriors,  
While foes were gathering,  
In the unknown land.

I approached and saw a shadowy bier,  
— Oh, how can I keep from weeping —  
There lay dead and wounded,  
The soul of my nation!